

康熙皇帝的焦慮 ——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

葉高樹**

摘要

本文以鞏固皇權為論述的主軸，選定引發康熙皇帝焦慮情緒且彼此交互作用的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等三個議題，借用心理學對「焦慮」的詮釋，剖析康熙皇帝面臨威脅時產生的不安，以及持續與之對抗的努力。康熙三〇年代以降，因立儲造成皇帝和皇太子胤礽之間的權力關係緊張，而皇帝親征噶爾丹期間胤礽的表現令人失望，遂衍生皇權分化的危機。其次，來自準噶爾部噶爾丹及其後繼者持續對清朝施加的軍事壓力，阻礙帝國邊疆開拓的進程，也使得皇權的擴張受到挑戰。正由於儲位懸而未定，開邊未竟其功，導致康熙皇帝晚年十分在意後世對他的評價，故而以皇帝的權威預先勾勒出個人的歷史定位。這三件事之間互相關聯，都對康熙皇帝形成壓力和困擾，他面對問題的態度及其選擇的應變之道，當是值得研究的課題。因此，本文擬將討論的重點集中在：一、威脅：皇權分化與邊境生變；二、面對：蒙藏問題與廢立太子；三、競爭：評價歷史與自我評價，以此三個面向對康熙皇帝進行心理層面的分析。

關鍵詞：康熙皇帝、焦慮、胤礽索額圖、準噶爾、噶爾丹

* 本文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102-2410-H-003-008）補助，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 在位）嘗言，自聽政（1667）以來，以內政上的三藩、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廬念」，「書而懸之宮中柱上」；迨康熙三十一年（1692），雖然只有三藩問題獲得解決，猶掛記「河務不可不得其人，一時漕艘有悞，關係非輕」。¹其實，他在處理三藩的過程驚險萬狀，事後也不得不承認：「前者，凡事視以為易，自逆賊變亂之後，覺事多難處」。²值得注意的是，歷時八年（1673-1681）的三藩戰爭及其勝利，牽動康熙朝中期以後的政治走向：一、戰爭初期，康熙皇帝為爭取漢族支持，特意打破滿洲傳統，仿漢制立「嫡長子」胤礽（1674-1724）為皇太子，卻引發皇權和儲權的對立。二、戰後，緊接而來的攻取臺灣（1683）和對俄羅斯的兩次雅克薩戰爭（1685-1686），激起他經略邊疆的雄心，國政的重點轉為邊務。預立儲君和邊疆開拓原本互不相涉，然因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696-1697）皇帝親征厄魯特蒙古準噶爾汗噶爾丹（1644-1697）期間，留京理政的皇太子「暱比匪人，素行遂變」，³為父子關係埋下嫌隙，導致日後廢太子（1708）和再立（1709）、再廢（1712）之舉，並釀成諸皇子間的繼承權之爭。其次，雖然噶爾丹病死陣前，⁴但是來自準噶爾的威脅仍未解除，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西藏問題，朝廷必須持續用兵和加強

¹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冊3，頁T1231，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己卯。

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冊3，頁1771，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癸酉。

³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220，〈諸王傳六·聖祖諸子·理密親王允礽〉，頁9062-9063。

⁴ 《清實錄》載：「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然據在前線的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詢問噶爾丹部眾，告稱：「噶爾丹於三月十三日晨病，至晚即卒，不知何病」。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83，頁956下，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子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182，〈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奏報丹濟拉來歸摺〉，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官書、檔案對噶爾丹的死亡時間、原因的說法不同，當以檔案為可信。見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年），頁64-68。

對蒙、藏民族的控制；而康熙五十七年（1718）任命皇十四子胤禛（1688-1755）為撫遠大將軍出征青海，再度掀起預選繼承人的猜想，⁵使中年以後的康熙皇帝一直處在家事與邊事的困擾中。

基於處理三藩事變的教訓，促使康熙皇帝「每遇事必慎重圖維，詳細商榷而後定」，⁶終能成就文治、武功並盛的事業，後世也給予極高的評價。《清史稿·聖祖本紀》，論曰：

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覩。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⁷

然因儲位懸而未定、開邊未臻全功，加以在位日久，康熙皇帝不禁擔憂「未卜後人之議論如何」，⁸故而晚年汲汲於個人業績的論斷，積極追求非己所能控制的歷史定位。

康熙皇帝面對家事、邊事和身後事顯露的不安，以及嘗試擺脫困境的心態，近似現代社會所謂的「焦慮」（anxiety）情緒。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對「焦慮」的定義為：因肉體的、心理的或認知的價值受到威脅時所引發的不安，而這個價值則被個人視為是他存在的根本。梅氏進一步指出，面對因壓力、敵意、競爭等情境所形成的焦慮，能夠使人的心智敏銳，只要願意持續與之對抗，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便有可能，也是獲致成功的途徑。⁹以往學者對康熙朝中晚期的儲位問題和邊疆政策頗有

⁵ 金承藝，〈胤禛：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收入金承藝，《清朝帝位之爭史事考》（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29-139。

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3，頁1771，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癸酉。

⁷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8，〈聖祖本紀三〉，頁303。

⁸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5下，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

⁹ 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4年），頁257。西方文化允許的焦慮減壓法，是要人們加倍努力地去獲取成功，因此焦慮會使人更努力地投入競爭，但是更多的競爭只會帶來更深的孤立、敵意

討論，¹⁰卻較忽略從康熙皇帝的立場，就鞏固皇權的面向進行心理層面的分析，至於康熙皇帝的自我評價，更鮮有觸及者。¹¹由於康

和焦慮，形成「相互競爭的個人努力→社會內部的敵意→孤立→焦慮→更多的競爭努力」的循環。見同書，頁289。

¹⁰ 關於康熙朝立儲及其引發宮廷鬥爭的討論，參見吳秀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頁26-169；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121-368；林乾，《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臺北：正展出版公司，2003年），頁169-283。研究者對於此一議題的關注，更集中在由此衍生而來的皇四子胤禛得位是否合法的爭論上，相關研究成果極夥，綜合評述可參見馮爾康，《雍正繼位之謎》（臺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頁1-163；馮爾康，《雍正繼位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5-160。有關康熙朝中期以後清廷對準噶爾政策，中國學者多以「統一戰爭」為論述基調，參見羅致平等編著，《準噶爾史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79-219；李秀梅，《清朝統一準噶爾史實研究：以高層決策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頁1-100。有別於「統一」觀點的討論，例如：伊·亞·茲拉特金認為噶爾丹力求建立一個神權的、獨立的蒙古國，而清朝始終對準噶爾存有侵略的野心；宮脇淳子則主張準噶爾是蒙古帝國的延續，康熙皇帝不願見到外來勢力介入喀爾喀蒙古和藏傳佛教事務，遂引起雙方長期的衝突，參見伊·亞·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1635-1758）》（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66-302；宮脇淳子著，曉克譯，《最後的游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3-34、頁100-141。

¹¹ 近日出版的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書，借鑒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以解讀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長篇「面諭」為中心，分就立廢皇太子、安排歷代統緒、準噶爾戰爭諸事，析論上諭中「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語的意涵，值得參考。其中，〈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與皇太子的興廢及玄燁的內心世界〉，認為康熙皇帝幼年缺乏關愛和長期處在威脅感的經歷，形成他內心膽怯又亟思報復的矛盾心理，皇太子似有持久心因性精神障礙的問題，導致父子關係緊張，而《面諭》則透露出皇帝晚年孤獨與惶惑的心境；〈再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歷代帝王廟與玄燁的道學心訣〉，指出康熙皇帝將集權政治和學術專制相揉雜，為說服漢族接受其統治，不僅以身兼治統和道統自居，更操作歷代統緒，使清初官方對中國歷史的論述，從為本朝爭正統擴展成新型的歷代正統論；〈準噶爾之役與玄燁的興兵之由〉、〈準噶爾之役與玄燁的盛世心態〉兩篇，闡明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清、準戰爭的本質，不只是進青海以圖西藏，更是康熙皇帝炫耀盛世心態的必要手段，既迥異於中國學者「統一戰爭」之說，亦批判新清史「內陸亞洲」之論。尤其在〈盛世心態〉一文中，描繪出皇帝在承平盛世的緊張心理、身體失調和精神抑鬱的交互作用，以及自豪與悲觀交錯的複雜情緒，在在影響他對局勢的判斷和採取的因應措施。以上各篇收入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71-161、頁162-249、頁250-348、頁349-453。姚書的宗旨，係論證康熙皇帝致力於確保滿洲征服者統治地位的同時，更竭力使漢族承認清朝統治中國的正當性，以及呈現康熙朝專制皇權的特質，雖然研究方法、議題選定與本文極為相近，但是觀點、解釋和目的則有不同。

熙皇帝擅於利用長篇鴻論的上諭，在臣民面前公開表述個人的功業；透過具機密性的奏摺硃批，對皇太子、諸皇子指導啓迪，以及對文武臣工指授方略，言談之間透露較多個人的內心世界，¹²或可借用心理學對「焦慮」的詮釋，¹³解析康熙皇帝在面對立儲、開邊和歷史定位等問題時的反應及其因應之道。

二、威脅：皇權分化與邊境生變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初三日，皇后赫舍里氏（1653-1674，孝誠仁皇后）爲康熙皇帝生下皇二子胤礽，旋即難產死於坤寧宮。帝、后兩人感情甚篤，康熙皇帝爲此輟朝五日；在二十七日大行皇后權厝都城北鞏華城之前，他幾乎天天親詣梓宮舉哀。¹⁴是時，在雲、貴舉兵反清的平西王吳三桂（1612-1678）已攻佔四川、湖南，進逼陝西、湖北，駐守桂林的廣西將軍孫延齡（?-1677）、據有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1682）等亦相繼附從。雖然坐鎮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適時輸誠，但是清朝的半壁江山岌岌可危。戰事爆發的導火線，係朝廷撤藩決策所致，而吳三桂膽敢放手一搏的原因，則在自恃「地險財富，所屬親軍與兩迤諸鎮將健卒皆百戰之銳，素得其死力，即他省平日所植黨，起兵當無不從

¹² 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岡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紙》（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

¹³ 人們遭遇焦慮情境的反應，會隨不同文化而變化，西方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將個人主義和競爭性匯整在一起，做為化解焦慮壓力的途徑，從而塑造出個人以加倍努力去獲取成功的競爭模式。見羅洛·梅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頁226-232。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極具競爭力的成功者，惟經由歷史文獻的解讀，實無法準確地判斷他是否曾經產生焦慮情緒；加上時空環境、文化背景的差異，自然難以直接移植心理學的解釋模式。另一方面，心理學家對人的焦慮反應進行臨床研究，提出許多精細的觀察和分析，但是個案的案主都是一般大眾，而本文的研究對象卻是帝國的統治者，即便康熙皇帝曾因焦慮而出現類似的情緒或行為的反應，仍無法也不應一概而論。然根據前述的焦慮定義和「焦慮—競爭—成功」模式，若將之理解為：焦慮是人遭受威脅、面臨敵意、承受壓力時，勇於面對問題並設法解決問題的反應，當可從「焦慮」的角度來理解康熙皇帝的行為。

¹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1，頁162-164，康熙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丁卯至五月二十七日庚寅。關於帝、后感情的討論，見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頁98-106。

命。且開國諸宿將多先後物故，無足抗顏行者」。¹⁵戰爭初期，確如吳三桂預料，其舊屬、黨羽追隨者甚眾，而朝廷以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1706）為中心、八旗勁旅為主力的攻防部署，未能發揮禦敵的效果，遂不得不重用漢族將領和綠營兵丁。¹⁶在兵馬倥傯之際，康熙皇帝以「朕荷天祐，誕生嫡子」為名，復承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1613-1688，孝莊文皇后）、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1641-1718，孝惠章皇后）慈命，¹⁷於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十三日，「授允（胤）礽以冊寶，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重萬年之統，以繫四海之心」。¹⁸康熙皇帝捨棄「八王共議」的祖宗家法，¹⁹決意採行漢式的嫡長子繼承制，具有伸張皇權、鞏固統治的意義，同時也獲得漢族官僚的歡迎，卻因違背滿洲舊制，招致部分滿洲王公、大臣反彈，²⁰而為往後的政局投下變數。

在清朝，預立儲君實屬創舉，朝廷特為訂定若干相對應的措施。先是，順治元年（1644）入關之初，中央部院衙門多承前明舊制，「以侍從輔導東宮為職」的詹事府也被沿用。²¹清制，詹事府係「東宮僚屬，職在侍從，並司講讀牋奏之事」，²²其性質與「職在侍從禁庭，進直講筵，記注起居，撰擬冊詔等文，纂修國史諸書」的翰林院相近，²³故兩者互兼職掌。由於詹事府、翰林院的職能，又與關外時期由「筆帖赫包（*bithei boo*，書房）」擴大而來的

¹⁵ 清·劉健，《庭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4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卷4，〈開藩專制〉，頁38。

¹⁶ 商鴻達，〈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漢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1（北京，1984.1），頁55-59。

¹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56，頁723上，康熙十四年六月癸亥條。

¹⁸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58，頁757下-758上，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丁卯條。

¹⁹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冊19，頁128，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

²⁰ 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137-152。

²¹ 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216，〈詹事府〉，頁1079下。

²²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第73輯，冊729，卷155，〈詹事府〉，頁7446。

²³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155，〈翰林院〉，頁7415。

內三院（內弘文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重疊，設置不滿一年便併入內三院。順治九年（1652），復置詹事府；十五年（1658），再將之裁撤，則受內閣、翰林院與內三院互為更迭的影響，其中還涉及滿洲統治階層對採行漢制態度的角力，²⁴然終遭廢棄的原因，當在順治皇帝（1638-1661，1644-1661在位）未立東宮。迨冊立皇太子，即恢復詹事府的建置。²⁵

其次，康熙皇帝命皇后赫舍里氏的叔父大學士索額圖（?-1703）研擬皇太子「一切禮儀」。²⁶以彰顯「上下有章，等威有辨」的冠服為例，²⁷《大清會典》曰：

皇太子冠服。康熙十四年題准，冠用東珠十三顆鑲頂，禮服用秋香等色，五爪、三爪龍緞滿翠八團龍等緞，俱隨時酌用，束金鑲玉版嵌東珠帶。²⁸

比較皇帝、親王冠服規制：

皇帝冠服。崇德元年（1636）定，冠用東珠寶石鑲頂，服黃袍，束金鑲玉版嵌東珠帶。康熙二十二年（1683）定，凡大典禮，及祭壇廟，冠用大珍珠、東珠鑲頂，禮服用黃色、秋香色、藍色，五爪、三爪龍緞等項，俱隨時酌量服御。²⁹

親王冠服。崇德元年定，冠頂三層，上御紅寶石，中嵌東珠八顆，前舍林（*šerin*，掩額，為保護前額而在盔帽上橫釘的鐵件，用於冠服上則指「金佛頭」），嵌東珠四顆；後

²⁴ 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收入陳捷先，《清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頁123-126。

²⁵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155，〈詹事府〉，頁7447-7448。

²⁶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7，頁712下，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條。

²⁷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2輯，冊716，卷48，〈禮部·冠服·序〉，頁2305。

²⁸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48，〈禮部·冠服·皇太子冠服〉，頁2307。

²⁹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48，〈禮部·冠服·皇帝冠服〉，頁2305-2306。

金花，嵌東珠三顆；帶用金鑲玉版四片，嵌東珠四顆。順治九年題准，冠頂三層，共嵌東珠十顆，舍林嵌東珠五顆，後花嵌東珠四顆，服用五爪四團龍補，及五爪龍緞滿翠四補等緞。³⁰

可知其中的等級差異。然而，康熙五十二年（1713），即第二次廢太子之後，康熙皇帝特別指出：「索額圖懷私倡議，凡皇太子服御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注，與朕無異。」³¹當時群臣未有異議，顯然已非「秋香色」。惟自崇德元年起，便有「親王以下官民人等，俱不許用黃色」的禁令；順治八年（1651），又增加「一應朝服、便服，表裡俱不許用黃色、秋香色」的規定，³²是以皇太子的服御諸物無論是黃色或秋香色，都足以說明其地位特殊。

再以皇太子的禮儀待遇而言，康熙二十五年（1686），當皇太子即將屆滿十二歲時，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以「皇太子出閣講書，其元旦等節，諸王、大臣應否奏進箋文」請旨，康熙皇帝裁示：「諸王、大臣於皇太子前行兩跪六叩禮，爾等察例議奏」。³³越數日，覺羅勒德洪等再以摺本請示皇太子出閣應行典禮，皇帝則曰：

人君豫教太子，令出閣讀書，原期於朝夕無間，洞澈書史，實有益於身心，實有裨於治道，本不在此繁文縟節也。……我朝令太子出閣讀書，乃初次舉行，當垂之永久，遵循勿替。且皇太子宮殿尚未建造，諸王、大臣於何處行禮？此事關係最為鉅要，禮部所奏，爾等其詳議以

³⁰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48，〈禮部·冠服·親王冠服〉，頁2308。

³¹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22，頁T11903，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庚戌。

³²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48，〈禮部·冠服·冠服通例〉，頁2331。

³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2，頁1468，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壬子。

文。³⁴

表面上，皇帝似不重儀式虛文，實則十分在意其中呈現的儀式意義，以及亟欲凸顯皇太子的尊榮。又刑部尚書王士禎（1634-1711）記康熙三十一年禮部等議定皇太子接受朝賀禮一事，曰：

（三月十八日）禮部會同內閣、內務府議得，……嗣後元旦、冬至、千秋節，設皇太子儀仗於文華門外，皇太子於主敬殿陞座作樂。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排班於主敬殿階下，文武各官排班於文華門外，進箋，行二跪六叩頭禮。其謝恩諸王各官於皇上前行禮畢，俟駕還宮後，詣昭德門前，於皇太子前行二跪六叩頭禮。每月六次常朝官員，免詣皇太子前行禮可也。其行禮儀注，屆期具題，樂章，翰林院撰擬；陳設儀仗，交鑾儀衛。奉旨：謝恩官員啟皇太子前行禮著停止，餘依議。³⁵

其隆重程度幾近於皇帝。日後，康熙皇帝抱怨，曰：「一切禮儀皆索額圖所定，總未詳察，服用儀仗等太為過制，與朕所用相等。」然儀制皆經皇帝批准始得施行，而大學士馬齊（1652-1739）奏稱：「二阿哥儀仗，與皇上儀仗無異，但尺寸稍減耳」，³⁶方近乎實情。此外，皇帝提供皇太子的生活用度極為寬裕，不僅勝於眾妃嬪、諸皇子，有時甚至超越皇帝本人。³⁷康熙皇帝給予皇太子種種禮遇，或出自為國家建立體制的設想，或源自對皇后無法割捨的情感，然誠如他自己所言，「禮節繁多，則父子之間反或疏遠，歷觀前代往往有之」，³⁸由禮儀引發的聯想和猜疑，便成為父子關

³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2，頁1472，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初六日己未。

³⁵ 清·王士禎，《居易錄》，清康熙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卷17，頁18上-18下。

³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3，頁2485，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庚午。

³⁷ 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170-171。

³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2，頁1472，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初六日己未。

係疏離乃至惡化的癥結所在。

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在戡定西南三藩、征服東南臺灣、驅逐東北俄羅斯的戰爭過程中，引進年輕筆帖式和內廷南書房文學侍從參與決策，從而架空內閣和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責，皇權乃隨之擴大。³⁹惟與此同時，漠北喀爾喀蒙古諸部紛爭不斷，來自漠西厄魯特蒙古的噶爾丹則乘隙介入，造成清朝西北邊疆騷動。對康熙皇帝而言，厄魯特蒙古、喀爾喀蒙古早在皇太極（1592-1643，1627-1643在位）時期即已遣使來貢，⁴⁰自然是以「一切生民，皆朕赤子」的姿態臨視；⁴¹帝國邊境生變，令他感到「朕視四海一家，中外一體至意」遭漠視，⁴²「天下主」的地位受挑戰。⁴³雖然噶爾丹在康熙十年（1671）繼承其父巴圖爾渾台吉（?-1653）、兄僧格台吉（?-1670）的汗位之後，亦請准「照常遣使進貢」；⁴⁴縱使清朝主觀地認為「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累世恭順，職貢有年」，⁴⁵他卻未必有「臣屬」的認知和意願。尤其曾「投達賴喇嘛，習沙門法」的噶爾丹，⁴⁶更視康熙皇帝為與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領袖五世達賴

³⁹ 楊錦麟，〈筆帖式與1673-1683清朝決策系統〉，《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2（廈門，1984.3），頁85-90；朱金甫，〈論康熙時期的南書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2（北京，1990.3），頁33-38。

⁴⁰ 厄魯特蒙古有和碩特、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部，「入貢」者為和碩特、準噶爾。見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39，頁505下-506上，崇德二年十月丙午條；同書，卷55，頁745上，崇德六年四月甲子條。喀爾喀有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扎薩克圖汗部、賽因諾顏部之分，諸部「來朝進貢」，始於崇德三年。見同書，卷43，頁568下-569上，崇德三年八月壬子條。

⁴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69，頁888下，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條。

⁴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12，頁151下，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條。

⁴³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24，頁314上，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乙亥條。

⁴⁴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38，頁506下，康熙十一年正月庚午條。

⁴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31，頁410下，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庚子條。

⁴⁶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354，卷1，頁9。

喇嘛（羅桑嘉措，1617-1682）並列的「中華皇帝」，⁴⁷而非天下唯一的統治者。

先是，喀爾喀扎薩克圖汗部內亂，其部民多逃往土謝圖汗部，因屢索不還，乃訴於清廷和達賴喇嘛。康熙二十五年，皇帝遣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會同達賴喇嘛使者西勒圖前往調停，並於八月在枯冷白爾齊爾為兩部主持「自今以往，當永遠和協」的會盟。⁴⁸次年，噶爾丹分別致書阿喇尼和駐土謝圖汗部的漠北格魯派領袖一世哲卜尊丹巴（羅桑丹貝堅贊，1635-1723）呼圖克圖（*hūtu*ktu，聖者，漢譯「活佛」），譴責他們在盟誓時不禮敬達賴喇嘛使者，並自行與扎薩克圖汗部會盟，⁴⁹此舉無疑是破壞漠北草原的新秩序。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復以土謝圖汗殺扎薩克圖汗沙喇（?-1688）、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布（?-1688）為名，大舉出兵，誓言必滅喀爾喀、擒哲卜尊丹巴。⁵⁰次年，康熙皇帝以調停者的姿態欲化解爭端，先請達賴喇嘛出面，「務令兩國嗣後永息兵戎」；⁵¹又頒敕書，諭令噶爾丹停止戰爭，噶爾丹覆以：「達賴喇嘛所言之事，若與聖上敕諭相同，我自無他說也」。⁵²事實上，五世達賴喇嘛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圓寂，西藏第巴桑結嘉措（1653-1705）為謀攬權而隱匿不報，並支持噶爾丹出兵，⁵³於是假借達賴喇嘛的名義，

⁴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37，頁468下，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條。

⁴⁸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3，頁21，康熙二十五年十月。

⁴⁹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4，頁3-7，康熙二十六年四至六月。

⁵⁰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4，頁29，康熙二十七年八月。

⁵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39，頁515下，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丁亥條。

⁵²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5，頁33，康熙二十八年四月。

⁵³ 柳岳武，〈清廷康熙朝的西藏政策〉，《黑龍江民族叢刊》，2007：6（哈爾濱，2007.12），頁101。桑結嘉措原係五世達賴喇嘛下管事之人，康熙三十二年，他以達賴喇嘛的名義向清朝疏稱：「但臣已年邁，國事大半第巴主之，已在睿照中。即第巴向亦仰體聖意，實心行事，……乞皇上給印封之，以為光寵。」經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同意所請，於次年賜金印，遂為土伯特（西藏）國王。見清·馬齊

要求清朝將土謝圖汗、哲卜尊丹巴交給噶爾丹，致使調解破局。康熙皇帝對達賴喇嘛的處理態度頗有懷疑，而予以拒絕，⁵⁴並一改以往對噶爾丹的不干預政策，也為防止他和達賴喇嘛聯手建立一個統一的蒙古國，故而徹底消滅噶爾丹便成主要任務，⁵⁵遂有三次親征之舉。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噶爾丹率兵攻打喀爾喀，旋即入據漠南，進逼清朝汛界。康熙皇帝下令親征，惟師出不久便因沿途「寒燠不常，似難調攝」，⁵⁶只得先行返京。反觀噶爾丹，一路勢如破竹，甚至直言：「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我與中華，一道同軌」。⁵⁷八月初一日，兩軍在烏蘭布通大戰，雖然清軍的人數、武器佔有優勢，⁵⁸並宣稱「大敗噶爾丹」，⁵⁹事後康熙皇帝猶侈言：「朕以策誘噶爾丹入，距京師僅七百里許，大兵已經擊敗，乃竟中賊計，致噶爾丹遁走」，⁶⁰實際上至多只能說是以「慘勝」收場。⁶¹不過，喀爾喀蒙古因不堪長期的內鬥和噶爾丹的侵逼，已在

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61，頁765下，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辛未條；同書，卷163，頁781下，康熙三十三年四月丙申條。

⁵⁴ 關於使者善巴陵堪卜傳達達賴喇嘛的口信，以及康熙皇帝對此事的回應，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3，頁576上-577上，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辛未條。

⁵⁵ 伊·亞·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1635-1758）》，頁264-265。

⁵⁶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7，頁629上，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壬子條。

⁵⁷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7，頁29，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⁵⁸ 洪用斌，〈試論烏蘭布通戰爭的結局〉，《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6（呼和浩特，1984.11），頁62。

⁵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8，頁633上，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條。

⁶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70，頁843上，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甲戌條。

⁶¹ 據傳教士白晉的記述：「在反擊厄魯特汗的一次戰役中，皇帝知道他的軍隊所以蒙受重大損失而未能將敵軍徹底擊潰，是因為厄魯特人仗著良好排槍的強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騎兵退出戰線」。見法，白晉（Joachim Bouvet）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37。以往多接受清朝官方說法，認為清軍大獲全勝，且噶爾丹方面傷亡慘重，近年的研究已重新檢討。見張羽新，〈烏蘭布通之戰的勝敗問題〉，《歷史研究》，1986：5（北京，1986.10），頁178-184；黑龍，〈烏蘭布通

前一年舉部來降，清朝將之「增設扎薩克（*jasak*，旗長），收集離散之眾，分爲旗隊」。⁶²康熙皇帝面對「人殊狡詐，難以深信」的噶爾丹，⁶³可說是束手無策，而操作喀爾喀蒙古歸附事，適足以轉化用兵邊疆無功的窘態。於是，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皇帝親臨多倫諾爾地方與喀爾喀諸部舉行會盟，依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編設」，⁶⁴取得實質的統治權；回程途中，發表「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爲堅固」之論，⁶⁵粉飾北疆邊防的穩固，然此時帝國的威脅不在「朔方」而在西北。

烏蘭布通戰後，噶爾丹的行蹤飄忽不定，欲乘隙生事的傳言甚囂塵上。⁶⁶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皇帝決意發動第二次親征（二月啓程，六月返京），曰：

今宇內無事，惟厄魯特噶爾丹違背約誓，恣行狂逞，掠我臣服之喀爾喀，恐漸致邊民不得休息，故特遣各路大兵，分道並進，務期剿蕩，為塞外生民除患。……假使及今不除，日後設防，兵民益多擾累。⁶⁷

而有五月的昭莫多之戰。兩軍尚未接戰，康熙皇帝得知噶爾丹兵

之戰再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北京，2006.7），頁66-71。又民間多持清軍落敗或未勝的觀點，見華立，〈從日本的《唐船風說書》看康熙二十九年的烏蘭布通之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3（北京，2010.9），頁41-50。

⁶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2，頁565上，康熙二十八年十月辛未條。

⁶³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8，頁637下，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丁丑條。

⁶⁴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51，頁674下，康熙三十年五月戊子條。

⁶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51，頁677上，康熙三十年五月壬辰條。

⁶⁶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16，頁7-8，康熙三十四年八月。

⁶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70，頁843上-843下，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甲戌條。

勢不強，對戰局充滿自信；⁶⁸當噶爾丹在主力遭重創前即已遁走，皇帝因親見其窮盡之狀，喜不自勝，卻為「觀噶爾丹情形，斷然不止」感到憂心，又為奉命追擊的撫遠大將軍費揚古（1645-1701）「至今無消息」而忐忑不安，只能期待費揚古兵至，「則噶爾丹即亡矣，萬一逃脫，亦不能再滋事」。⁶⁹是役，噶爾丹之妻阿奴（?-1696）被擒殺，清軍從降人丹巴哈什哈等人口中，始知五世達賴喇嘛早已過世，⁷⁰康熙皇帝才了解噶爾丹的背後有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⁷¹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在哈密被捕，噶爾丹流離於杭愛山、阿爾泰山之間，已陷入「居無廬，出無騎，食無糧」，部眾「俱不能自活，散去捕獸」的困境，⁷²康熙皇帝為防範其勢死灰復燃，甚至連結和碩特部或進入西藏，⁷³乃於二月初宣布進行第三次親征（二月啓程，五月返京）。四月中，康熙皇帝接獲費揚古奏報，噶爾丹身亡，厄魯特丹濟拉台吉等率眾來歸，⁷⁴戰事遂告一段落。

康熙三十五至三十六年的兩次親征，清朝看似頗有斬獲，但是來自帝國西北的威脅猶未解除。由於準噶爾降人揭發第巴代行

⁶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84-85，〈康熙帝諭皇太子胤初至噶爾丹駐處所見情形〉，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⁶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91，〈康熙帝諭胤初送衣物食物等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⁷⁰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26，頁4，康熙三十五年六月。關於昭莫多戰役的經過，見袁森波，〈康熙與昭莫多之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1（北京，1990.1），頁41-49；黑龍，〈康熙帝首次親征噶爾丹與昭莫多之戰〉，《滿語研究》，2009：2（哈爾濱，2009.12），頁129-136。

⁷¹ 康熙皇帝為追查噶爾丹與黃教的關係，令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平北大將軍馬思喀「將達賴喇嘛、班禪呼圖克圖、第巴交通噶爾丹之文，……俱查明收取，交一曉事賢能官，作速馳驛，送至御營」。又指派理藩院主事保住前往達賴喇嘛、班禪、第巴等處，究明原委。見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卷25，頁35，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02，〈主事保住奏請至達賴喇嘛處如何答覆摺〉，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初七日。

⁷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2，頁948上-948下，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壬辰條。

⁷³ 宮脇淳子著，曉克譯，《最後的游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頁31。

⁷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82，〈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奏報丹濟拉來歸摺〉，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

達賴喇嘛權力事，使康熙皇帝意識到帝國與蒙、藏民族的關係暗潮洶湧，是以他繼續闡述「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至明，歷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的論調，並表示將寬宥第巴之罪，相信「第巴必感恩，而眾蒙古亦歡悅矣」。⁷⁵同時，拒絕禮部上徽號之請，只舉行祭告天地、太廟諸典禮，低調地迎接勝利。究其所以，康熙皇帝檢討戰爭得失，烏蘭布通之役清軍陣亡、被創者甚眾，噶爾丹部於「歸路遭罹瘟疫」，得還者不過數千人，猶能負隅頑抗達六年之久，論及「滅賊方略」，則「舉朝皆以為難」，⁷⁶正是令他長期處於焦慮情緒的原因。因此，當和碩顯親王丹臻（1670-1720）等再以「昔年三逆蕩平，群臣請崇上尊號，奉旨不允。及收服喀爾喀，又經上請，亦未允行」，「噶爾丹既滅，群臣遭遇昌時，欣睹盛事，合詞上籲，實出至誠」勸進尊號，⁷⁷仍遭否決。至於一連串的祭告儀式，則有撫平他內心焦慮的作用。⁷⁸然而，欣喜之心終究難掩，康熙三十七年（1698），皇帝下令在主要戰場勒石立碑，向蒙古諸部宣揚帝國「綏靖邊陲」、「安定遐荒」、「丕振武功」、「敷天永福」的壯舉；⁷⁹又立碑於太學，闡明實現文治、武功並盛的努力，申論「欲以文德化成天下」的理想，以說服漢族士人能了解他「嚮意於三代」的用心。⁸⁰

⁷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0，頁931上-931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寅條。

⁷⁶ 參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3，頁964上-965上，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條。

⁷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3，頁965上，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條。

⁷⁸ 宗教儀式能在人們面對不安和危險時，提供克服焦慮的途徑，而能夠繼續努力，這個現象普遍存在於早期社群之中。見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廖月娟譯，《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4年），頁326-330。

⁷⁹ 分別引自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298，卷35，〈銘·察罕七羅勒石銘〉，頁11；同書，卷35，〈銘·拖諾山勒石銘〉，頁11；同書，卷35，〈銘·昭莫多勒石銘〉，頁12；同書，卷35，〈銘·狼居胥山勒石銘〉，頁12。

⁸⁰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

三次親征期間，皇帝和皇太子的關係也出現微妙的變化。康熙皇帝在第一次親征出發未久，便因違和提前回鑾，《起居注冊》記：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寅，皇帝駐蹕正紅旗鷹庄，「是日，皇太子、皇三子（胤祉，1677-1732）自京師馳至，問上安」。⁸¹《實錄》將此事繫於癸丑日（二十四日），並在兩位皇子請安之後，增記皇太子「見聖體未寧，天顏清減，略無憂戚之意，見於詞色。上以允礽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甚不懌，令即先回京師」。⁸²在法國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的記憶中，也有類似的情節，但「略無憂戚之意」者，則是皇太子身邊侍從。⁸³無論任何人有此態度，康熙皇帝都會感受到其中的威脅，⁸⁴但是胤礽的言行在皇帝看來仍極為敬謹，⁸⁵故而未採取防範措施。第二次親征

34，〈碑文·平定朔漢告成太學碑〉，頁3-4。

⁸¹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1，頁T00401-T00402，康熙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寅。

⁸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47，頁629下，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丑條。

⁸³ 白晉記載此事的內容為：「六年多以前，……皇帝像往常一樣，到韃靼山區打獵，但在此期間，由於生了重病，生命垂危，就通知皇儲經驛站趕來。皇儲的一些侍從希望自己的主子能早日登上皇帝寶座，因此，對皇上病危不夠悲痛，甚至流露出一些喜色。皇帝獲悉後，盡管對此舉動憤怒萬分，然而這一次，他為了不使自己的疾病惡化，控制了自己的情感，不發火，也不馬上給予懲罰。當他復原後，……皇帝就從太子的保傅開始，給那些有罪之人一頓嚴厲的棍打，並將某些有關的重要的寢宮太監發配到韃靼邊境去充軍」。見法，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頁234。白晉提到：「康熙今年四十四歲，執政已經三十六年」，所謂「六年多以前」，即康熙二十九年。然查閱《起居注冊》，是年皇帝除頻繁前往暢春園，以及親征之外，只有在二月初四日至十一日和十二月初三日至二十四日，兩次前往孝陵（順治皇帝陵寢）拜謁，並無外出打獵的紀錄。白晉又記：「六年多以前，……當時的西韃靼族厄魯特汗，帶了一支軍隊，進擾邊境，康熙皇帝的舅父（佟國綱）就在一次反擊戰中犧牲了」，則「六年多以前」的「打獵」，應是指「親征」。見同書，頁196、頁218-219。

⁸⁴ 楊珍比較《聖祖實錄》、白晉《康熙帝傳》對康熙皇帝生病事的記載，認為在皇帝的包容和溺愛之下，皇太子的品行的確有可議之處，但此時父子關係尚未惡化，皇太子也未必如此愚蠢地展露出野心，此事應該是反映皇太子屬下的特殊心態。見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178-180。《實錄》載：「上以允礽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甚不懌，令即先回京師」，語意上似為連續的過程，然據《起居注冊》，「八月初一日己未，上命皇太子先回京師」，則皇太子在行在停留五天之後，始接獲「先回京師」的命令。見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1，頁T00405，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己未。

⁸⁵ 例如：康熙三十三年，禮部奏祭奉天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內，惟殿內甚

時，康熙皇帝命胤祜留京理政，並頻繁地以書信向他講述沿途見聞、戰事進展，以及傳達對皇太后、諸皇子關懷之情，⁸⁶一旦胤祜回函稍有遲滯，便有不安的情緒。⁸⁷相較於皇帝熱情洋溢、思念殷切的硃諭、硃批，⁸⁸胤祜的奏摺除「恭請皇父萬安」一句之外，盡是辦理政務、請示機宜，幾無表達思慕、關切之心，⁸⁹顯然對父親的感情頗為冷淡。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皇帝返抵京師，旋接獲噶爾丹部在達蘭土魯地方出沒的疏報，於是自九月初展開長達四個月的巡邊，期間仍令胤祜留京。時胤祜已是二十三歲才學兼備的青年，其驕縱的性格與缺乏責任感的態度亦逐漸顯露。⁹⁰例如：當他獲悉皇帝率眾皇子在塞外捕馬、獵兔，竟表示「極為難過，欲哭」，甚至以「今春百餘日未在膝下，今又有二月餘未睹天顏，兒臣眷戀之心實難忍」為辭而執意前往。⁹¹康熙皇帝在巡邊期間，持續告知胤祜

窄，皇帝拜褥已挨檻鋪設，實無餘地，康熙皇帝指示皇太子拜褥應著鋪檻外，禮部尚書沙木哈竟要求「將此旨記檔」，引起康熙皇帝不滿，認為禮部所進儀注刻意逢迎皇太子。皇太子奏稱：「此處臣竟不知，皇父行禮之處，臣斷不可行禮。」皇帝復以「皇太子出入雖開午門中門，亦止從旁行走，斷不由中道」為例，說明皇太子「盡敬之處」，乃下令議處沙木哈等人。見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5，頁T02410-T02416，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日丁未。

⁸⁶ 岡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紙》，頁40-49；齊木德道爾吉，〈康熙之路——記康熙皇帝首次親征噶爾丹〉，收入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第6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9-199。

⁸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83，〈康熙帝諭皇太子胤祜親征噶爾丹情形〉，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十日。

⁸⁸ 例如：諭皇太子，曰：「……恰遇出兵追擊，今喜悅返回，不勝思念爾。今值天熱，將爾所著棉紗、棉葛布袍四件、褂四件送之，務送舊者，朕思念爾時穿之。……十二日見皇太子遣送數種物品，欣喜食之」。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91，〈康熙帝諭胤祜為送衣物食物等事〉，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⁸⁹ 綜觀胤祜於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至五月間的二十二件奏摺，盡是例行公事，未見有對父親感情的表達。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69-92。

⁹⁰ 陳捷先，〈清聖祖廢儲考原〉，收入陳捷先，《清史論集》，頁145-153。

⁹¹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年），第8輯（滿文諭摺第1輯），頁429-431，〈皇太子胤祜，奏請聖安並稟報宮中諸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漢譯本將「juwe biya fonceme（二月餘）」的「juwe（二）」誤認做「juwan（十）」，遂譯為「十月餘」。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19，〈皇太子胤祜奏為思念皇父及辦

其近況，因屢次得不到回音而動怒，⁹²則胤礽所謂的思念之忱實屬虛矯；將大政託付胤礽，他可為追逐畋獵之樂未遂而情緒失控，顯得不知權衡輕重；⁹³加以胤礽送往御前的鹿尾，因包裹鬆壞而損裂，反映出辦事草率、御下不嚴的一面，⁹⁴凡此種種，皇帝自是了然於心。當胤礽察覺皇帝的不悅，連忙承認鹿尾一事「皆因未周查，非力不能及，倘再遣送，當小心謹慎」，並以「恭閱諭旨所寫何時行走，圍獵殪兔數額，即如臣親眼見，不勝驚喜」，⁹⁵來掩飾先前的失態，更罕見地向父親噓寒問暖，⁹⁶試圖修補父子關係的裂痕。胤礽的應對似乎發揮作用，故緊接而來的第三次親征，皇帝猶指派他留守。此時，胤礽也一改以往，積極回覆父親的來函，字裡行間不斷傳達欽慕之情；⁹⁷對交付事項皆能謹慎辦理，⁹⁸即便

理雜務摺》，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⁹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21，〈皇太子胤礽奏為各部所奏摺〉，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硃批」。

⁹³ 對於皇太子要求趕赴塞外一事，硃批曰：「宮中事亦重要，將此可想為易乎。……勿氣惱著急，慢慢等待。何必著急」。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8輯（滿文諭摺第1輯），頁429-431，〈皇太子胤礽·奏請聖安並稟報宮中諸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硃批」，「何必著急」係用漢字書寫。

⁹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21，〈皇太子胤礽奏為各部所奏摺〉，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硃批」。

⁹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8輯（滿文諭摺第1輯），頁488，〈皇太子胤礽·奏請聖安並報宮中諸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uthai amban meni yasa sabuha adali*（即如臣親眼見）」一句，漢譯本作「即如內臣親眼見」，滿文原文無「內」字。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24，〈皇太子胤礽匯奏諭旨摺〉，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⁹⁶ 胤礽奏曰：「又聞初八日已抵右衛，歸途大寒。似此寒冷，皇上從未見，隨行人等凍瑟不堪，唯皇父無妨，仍御薄衣窄帽而行，臣甚奇之。素知皇父耐寒，此次出征，欣悅體安，氣色甚好，故能更耐寒無恙，臣喜之不盡」。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27，〈皇太子胤礽請安並奏報官員赴任等事摺〉，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⁹⁷ 例如：當擒獲噶爾丹之子塞布騰巴爾珠爾的消息傳來，曰：「皇父如天，睿慮獨斷，為生民計，不辭勞苦，……噶爾丹唯有一子，尚不能保，皇父神機妙算，即予擒獲」；康熙皇帝在寧夏獵兔豐收，曰：「皇父前幸鄂爾多斯殪兔二百，聞之甚奇，此次殪兔三百餘，更聞所未聞也。臣不勝喜悅，讚嘆不已」；待噶爾丹敗亡，曰：「只此三次，頗費聖心，疲勞過度，宜趁暖早日回京，以瞻仰天顏。……臣聞大捷之日，癡呆不知所措，竟有兩整日不思飲食，亦難入睡」。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49-150，〈皇太子胤礽奏報解塞布騰巴爾珠爾往京城摺〉，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同書，頁159，〈皇太子胤礽奉旨奏

賚運極易腐壞的水果，也能完好送達，⁹⁹言行判若兩人，父子間的小摩擦理當告一段落。

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底，皇帝再次巡行邊外，命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1678-1735）、皇五子胤祺（1679-1732）、皇八子胤禩（1681-1726）、皇九子胤禕（1683-1726）等隨駕，¹⁰⁰進行為期一個半月的塞外之旅。在返抵京城前夕，皇帝突然諭令內務府總管海喇孫將「私在皇太子處行走，甚屬悖亂」的膳房人花喇、哈哈珠子（*haha juse*，伺候皇子的幼丁）德住、茶房人雅頭處死，膳房人額楚則交其父英赫紫圈禁家中。¹⁰¹然而，這些下人原本就在皇太子處行走，究竟觸犯何種「悖亂」，讓一向寬仁的康熙皇帝如此震怒，實值得推敲。胤礽長期享有幾與皇帝相當的禮儀待遇，且有掌理國政的經驗，加以身邊阿附之徒的慫恿，不免對個人地位的認知產生混淆。他們可能趁皇帝在外征戰，簇擁著皇太子，在京城玩起君、臣的角色扮演遊戲，此舉無疑侵犯皇帝的權威，一旦消息走漏，勢必招致嚴懲。關於胤礽涉嫌「僭越」，康熙皇帝應早有耳聞，在是年閏三月十七日胤礽措辭惶恐的奏摺中可略見端倪，奏曰：

……再頒臣諭旨內竟書有「請寄」、「請送」字樣。臣之榮顯富貴，皆仰蒙皇父之恩，及衣食生死，俱仰賴皇父，在

報出宮祭寺廟緣委摺》，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同書，頁185，〈皇太子胤礽請安並報宮內聞大捷歡慶情形摺〉，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⁹⁸ 例如：大軍在保德州渡黃河所用繩索，係由胤礽送來，因品質甚佳，得到皇帝稱讚。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46，〈皇太子胤礽奏報牧場失火羊與人被焚死摺〉，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硃批」。

⁹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45，〈皇太子胤礽進果品摺〉，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同書，頁146，〈皇太子胤礽奏報趕回軍中瘦馬分園飼養摺〉，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硃批」。

¹⁰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4，頁973下，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丁未條。

¹⁰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5，頁976下-977上，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壬辰條。所謂「悖亂」一事，《清史稿》有較多的敘述，惟言太子仍留京，以及處置太子左右用事者在「上還京師」之後，與《實錄》不合。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220，〈諸王傳六·聖祖諸子·理密親王允礽〉，頁9062-9063。

下發硃諭內寫此等字，不惟難以承受，即見此等語詞，渾身出汗，無地自容。¹⁰²

康熙皇帝的硃批卻輕描淡寫地帶過，曰：

若係家書瑣細，仍寫「請寄來，以悅視之」等字，看前書即得知，非只此次。況且寄給諸妃書內，亦如此寫的。再凡著給諸臣看，啟奏皇太后之諭旨中，想是沒有此類言詞罷。抑或因為忙，無意寫上，亦未可料。¹⁰³

諭旨書「請」，自然會令臣子「難以承受」、「無地自容」，但是康熙皇帝認為家書寫「請」字殊屬平常，則胤礽的反應顯得太過，不免啓人疑竇，而最不可告人者，當為「僭越」。再從硃批中「非只此次」、「無意寫上，亦未可料」數語來看，皇帝用「請」字試探的意味濃厚，胤礽驚惶失措的態度，無異使傳言坐實。

禮儀是引發皇太子行為違制脫序的根源，也是導致皇帝產生皇權分化焦慮的關鍵。理學大臣李光地（1642-1718）嘗言：「起居服物一同帝制，到底不妥。故連儀注也要斟酌。」¹⁰⁴日後康熙皇帝亦不得不承認皇太子一切儀注「與朕無異，儼若二君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驕縱之漸，職是之故」。¹⁰⁵然當再次面臨儲君可能對皇權造成的困擾，康熙皇帝一如處理康熙二十九年皇太子侍從的態度，選擇相信皇太子是受到雜役、小人蠱惑，乃藉巡邊的機會攜胤礽同行，既是對他幾次留京的彌補，又可使他脫離群小的包圍，且在懲治「悖亂」時也能維持他的顏面。康熙皇帝顧全父子親情的設想，不可謂不周，但是皇權分化的威脅並未因此解除，仍須面對親情和權力持續發生衝突的可能。

¹⁰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72，〈皇太子胤礽奏請御批內勿寫請示摺〉，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七日。

¹⁰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73，〈皇太子胤礽奏請御批內勿寫請示摺〉，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七日，「硃批」。

¹⁰⁴ 清·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18，〈治道〉，頁837。

¹⁰⁵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22，頁T11903，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庚戌。

三、面對：蒙藏問題與廢立太子

滿洲以少數的、外來的征服者之姿入主中國，皇帝視有效統治漢地、防範漢人反抗，為施政首要之務。事實上，關內漢人歷經明末以來長期的動亂與殺伐，期盼的是和平與治安，而清政權展現恢復秩序的能力，已讓人們感受到有實現的可能；¹⁰⁶加以順治皇帝宣示「崇儒重道」的大政方針，¹⁰⁷尤其康熙皇帝熱衷儒術，並以結合「治統」與「道統」為己任，¹⁰⁸故能綏服士庶屬望，進而化解漢族知識分子對滿洲統治階層的種族歧見，¹⁰⁹是以大約在三藩戰爭結束後，清朝在中國的統治權已臻於穩固。惟皇帝的注意力過度集中在內地和漢族，不免無暇兼顧經營邊疆，當對噶爾丹的戰事無法獲得實質勝利，皇帝的聲威勢必受損，「天下主」的地位亦將動搖，都是康熙皇帝為開邊而必須承擔並尋求解決之道的壓力。

自噶爾丹崛起後，準噶爾部和清朝的歷次交涉、交戰過程中，達賴喇嘛在噶爾丹陣營佔有一定的地位。早在三藩戰爭期間，康熙皇帝已察覺五世達賴喇嘛有迴護吳三桂之嫌，且其影響力足以左右蒙古諸部的動向；迨昭莫多之戰，經由調查第巴桑結嘉措隱匿達賴喇嘛圓寂，及其挑起厄魯特蒙古和喀爾喀蒙古的紛爭始末，更進一步認識藏傳佛教在蒙、藏民族精神層面上的意義，¹¹⁰促使康熙皇帝決心積極介入藏傳佛教事務。藏傳佛教原有紅教、黃教之分，明中葉以後，黃教不僅在西藏取得領導地位，且迅速拓展到蒙古，並以創教者宗喀巴（1357-1419）的兩大弟子達

¹⁰⁶ Jonathan D. Spence and John E. Wills Jr. edited,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xvii.

¹⁰⁷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74，頁585上，順治十年日月甲寅條。

¹⁰⁸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1（臺北，1987.3），頁105-121。

¹⁰⁹ 王爾敏，〈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247-271。

¹¹⁰ 孟昭信，《康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436-442。

賴和班禪「世以呼畢勒罕（*hūbirhan*，轉世靈童，漢譯「化身」）轉生，演大乘教」。¹¹¹順治十年（1653），順治皇帝派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等赴代噶地方，齎送冊封五世達賴喇嘛的金冊、金印，¹¹²承認他在藏傳佛教流傳地區的領導地位。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皇帝在不知達賴喇嘛已經去世的情況下，以哲卜尊丹巴促成喀爾喀蒙古與清朝的會盟，特仿順治朝前例，封之為「大喇嘛」，「於喀爾喀地方立為庫倫，廣演黃教」，¹¹³頗有另行扶植宗教領袖與之對抗的用意。當假冒達賴喇嘛名義事遭揭發後，由於康熙皇帝未予深究，桑結嘉措即表示：「青海八台吉俱達賴喇嘛弟子，但願為皇上效力，並無二心，臣可保其不背皇上」做為回報，¹¹⁴康熙皇帝則堅持應「尊奉班禪胡土克圖，使主喇嘛之教」，¹¹⁵試圖改變藏傳佛教的權力結構。降及康熙五十二年（1713），復以班禪呼圖克圖「為人安靜，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以印、冊，封為班禪額爾得尼（*erdeni*，珍寶）」。¹¹⁶五世班禪（羅桑意希，1663-1737）獲康熙皇帝刻意尊崇，在藏傳佛教的地位大為提高，幾與達賴喇嘛相當。

然而，清、藏雙方對六世達賴喇嘛的身分認定，卻有極大歧見。康熙三十六年，桑結嘉措宣布小達賴喇嘛（倉央嘉措，1683-1706）已十五歲，將於本年十月舉行坐床典禮，¹¹⁷奉為六世達賴喇

¹¹¹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52〈藩部傳八·西藏〉，頁14530。

¹¹²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74，頁586下，順治十年四月丁巳條。

¹¹³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624，卷142，〈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喇嘛封號〉，頁61。

¹¹⁴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0，頁926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己丑條。

¹¹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75，頁893上，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條。

¹¹⁶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53，頁504上，康熙五十二年正月戊申條。

¹¹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2，頁943下，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辛巳條。

嘛；清朝則視之為「立假達賴喇嘛以惑眾人」，拒絕承認。¹¹⁸康熙四十四年（1705），領有青海、西藏的蒙古和碩特部拉藏汗（?-1717）因與桑結嘉措有隙而殺之，向清朝奏明「假達賴喇嘛」情由，拉藏汗旋受封為「翊法恭順汗」，並將「假達賴喇嘛」執送北京。¹¹⁹清朝的強勢做法，不免造成蒙、藏民族的反彈，康熙皇帝乃於同年冊封曾事五世達賴喇嘛的二世章嘉呼圖克圖（阿旺羅桑卻丹，1642-1714）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¹²⁰以為安撫。章嘉和清朝關係良好，早在康熙三十二年已受封為扎薩克達喇嘛，負責漠南蒙古教務，足以和哲卜尊丹巴分庭抗禮。¹²¹至於清朝認可的達賴喇嘛的呼畢勒罕，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經班禪查證，並派內閣學士拉都渾赴西藏看驗後始確定；¹²²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才受封為「六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再由撫遠大將軍胤禎派官兵護送入藏。¹²³康熙皇帝採取「眾建」的方式，分化並限制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將黃教世界建構成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章嘉四大呼圖克圖分掌前藏、後藏、漠北、漠南等地，四大呼圖克圖都須獲得清朝敕封，方能取得合法地位，¹²⁴使皇權凌駕神權之上，達到他一心想實現的「總持道法」的目的。¹²⁵

¹¹⁸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27，頁280上，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丁亥條。若干載籍稱清朝曾派遣二世章嘉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主持坐床典禮，實際上清朝承認的「六世達賴喇嘛」，是後世奉為七世達賴喇嘛的格桑嘉措，且二世章嘉在格桑嘉措入藏之前已圓寂。見楊嘉銘，〈歷輩章嘉呼圖克圖與達賴喇嘛的師徒關係〉，《青海民族研究》，24：4（西寧，2013.10），頁108-109。

¹¹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27，頁280上，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丁亥條；同書，卷227，頁281下，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庚戌條。

¹²⁰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42，〈理藩院·典屬清吏司·喇嘛封號〉，頁61-62。

¹²¹ 鄧建新，〈試論清朝扶植章嘉呼圖克圖系統的原因〉，《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3：3（西寧，2007.7），頁38-41。

¹²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6，頁362下，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條。

¹²³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87，頁798上，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癸丑條。

¹²⁴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38-143。

¹²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75，頁891下，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條。

其次，噶爾丹在清朝邊境啓釁，或出自個人的政治野心，而喀爾喀諸部的內鬭，實提供可乘之機，暴露出帝國疏於掌握漠北情勢；康熙皇帝以「四海一家」、「中外一體」的統治者自居，來自漠西的噶爾丹卻僅視之為「中華皇帝」，則說明帝國的威望有其侷限，這些警訊令康熙皇帝必須思考重建「天下主」地位的問題。先是，自康熙十六年（1677）起，康熙皇帝即安排密集的巡行塞外活動，¹²⁶首次北巡途中，漠南蒙古諸部王公相繼來朝。¹²⁷康熙二十二年第三次北巡，皇帝在興安眺望昔日滿洲與蒙古「枕戈擐甲戰爭之所」，有感而發，撰文云：

……迨我列祖，肇握乾符，恢廓天緒，德威所被，四十八部罔不傾心內附。古之甌脫，今隸方輿。……於時遠邇大小藩臣，各率其屬，趨侍行殿，既於苗以講武事，復燕衍以懷遠人。撫此遐陬，在禹迹方行之外；聲教四訖，皆祖功宗德之貽。朕今紹祚，獲際昇平，能無永念乎？¹²⁸

說明此行具有維繫與漠南蒙古傳統情誼的作用。

在對噶爾丹的戰爭期間，康熙皇帝也曾多次前往塞外，其中又以康熙三十年五月在多倫諾爾地方與喀爾喀蒙古舉行會盟最為重要。喀爾喀土謝圖、車臣、扎薩克圖三汗歲進白駝一、白馬八

¹²⁶ 康熙皇帝巡行塞外的活動始於康熙十六年，一直持續至康熙六十一年，四十六年之間共計四十八次。見莊吉發，〈清初諸帝的北巡及其政治活動〉，收入莊吉發，《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236-238、頁264-267。康熙皇帝首次北巡，正值三藩戰爭期間，係因康熙十四年漠南蒙古察哈爾部趁亂起兵，雖然清軍迅速將之弭平，卻暴露出漠南蒙古未必順服的問題，使康熙皇帝有所警覺；迨康熙十六年，三藩中的耿精忠、尚之信相繼投降，戰局扭轉，故舉行巡邊，以撫綏蒙古。又康熙二十年的第二次北巡，皇帝在蒙古各部牧場中劃定範圍，建立圍場，逐漸形成「木蘭秋獮」之典。見王思治主編，《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收入朱誠如主編，《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上冊，頁520-523、頁527-528。

¹²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1，頁327-328，康熙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己丑至二十四日戊戌。

¹²⁸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298，卷38，〈古今體詩·駐蹕興安八首·序〉，頁3-4。

的「九白」之貢，由來已久，並和清政權建立本質為部落聯盟的臣屬關係，但始終「未嘗親身歸順」，此時土謝圖汗等「親率所屬數十餘萬人來歸」，故康熙皇帝「特往撫綏安輯」。¹²⁹事後，康熙皇帝宣稱：

喀爾喀之汗諾顏台吉等，知朕養蒙古，夙有厚恩，悉皆款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內附，恩養得所，必皆淪入於厄魯特，則爾時噶爾丹之勢力，不言可知矣。允其內附而恩養之，噶爾丹必假此衅端，與我朝構難。凡此情勢，皆經熟籌，受納喀爾喀，非漫然而為之也。¹³⁰

重新確認清朝與漠北蒙古的君臣關係，便是他解決「天下主」地位鬆動方案的第一步。迨戰爭結束，康熙皇帝又藉由各種場合向漠西蒙古展現恢復秩序的用心，例如：對厄魯特降人表示寬容，曰：「不惟噶爾丹在日，爾等降者，必加恩撫恤。即今噶爾丹已死，凡有降者，朕亦如爾輩恩育，豈容異視耶？」¹³¹對準噶爾親清朝勢力、噶爾丹之姪策妄阿拉布坦（1643-1727）則施以羈縻，以實質的政治支持和貿易利益為交換，要求他搜捕噶爾丹餘黨，曰：「如此，則爾始終恭順之心確著，亦得長沐朕之恩寵於無窮矣。倘若隱匿不行擒解，不但爾歷年之恭順皆虛，即爾貿易之人，亦永不許通行」，¹³²亟欲將帝國的實質影響力拓展至漠西。

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為因應巡行、狩獵的頻率增高、時間加長，以「熱河道近神京，往來無過兩日」，¹³³不致耽誤國

¹²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51，頁671下，康熙三十年四月丁卯條。

¹³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3，頁964下，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條。

¹³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3，頁958上，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戌條。

¹³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89，頁1009下，康熙三十七年八月壬寅條。

¹³³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9，卷22，〈記·避暑山莊記〉，頁12。

政，而「諸藩來覲，瞻禮亦便」，¹³⁴特選定在當地營建行宮，名曰「避暑山莊」。此舉既有回復北方民族尚武精神和「行國」傳統的象徵意義，也能發揮「整飭戎兵，懷柔屬國」的作用，¹³⁵遂為帝國的第二個政治中心。自此，康熙皇帝統治下的帝國重心不再以漢地自限，轉而面向內陸亞洲；相較於親征朔漠告戴即立碑太學，刻意迎合漢族偃武修文的價值觀，實為統治心理的一大突破。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5 在位）闡述祖父營造山莊的用心，曰：

非為一己之豫樂，蓋貽萬世之締構也。國家承天命，撫有中外，於古未有之地，盡入版圖；未服之國，皆受封爵。而四十八旗諸部落，屏蔽塞外，恭順有加，每歲入朝，席賚燕饗，厥有常典。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進塞為懼，……我皇祖俯從其願，歲避暑於此，鱗集仰流，而來者無不滿志以歸。……巡狩之典，或一歲而二、三舉行，耗財勞眾之論，夫豈不慮？然而，凜天戒，鑑前車，察民瘼，備邊防，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習勞苦之役，懲宴安之懷，所全者大，則其小者有不必恤矣。¹³⁶

所謂「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不只在領有漢地，更欲使皇權伸入蒙、藏部落，準確地傳達康熙皇帝欲為「天下主」的目的。

雖然邊疆情勢逐漸緩解，但是來自皇太子對皇權的威脅則尚待解決。自胤礽身邊下人「悖亂」案發生後，父子間仍保持和諧關係，直到康熙四十二年，皇帝突然下令將索額圖拘禁，才使雙方矛盾浮上檯面。是時，傳諭索額圖，曰：

¹³⁴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9，卷23，〈碑文·溥仁寺碑文〉，頁7。

¹³⁵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36，頁961下，乾隆六年二月癸卯條。

¹³⁶ 清·清高宗御製，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集·初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302，卷43，〈古今體九十五首丁卯七·避暑山莊百韻詩·序〉，頁2-4。

爾家人告爾之事，留內三年，朕有寬爾之意，爾並無退悔之意，背後仍怨尤，議論國事，結黨妄行。爾背後怨尤之言，不可宣說，爾心內甚明。……去年皇太子在德州住時，爾乘馬至皇太子中門方下。即此，是爾應死處，爾自視為何等人？……朕將爾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爾原係大臣，朕心不忍，但著爾閒住，又恐結黨生事，背後怨尤議論。著交宗人府，與根度（鎮國公，?-1723）一處拘禁，不可疎放。¹³⁷

索額圖牽涉僭越不敬、結黨妄行，以及「不可宣說」等情，似以後者最為嚴重。三年前，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索額圖為家人舉告；次年，時任領侍衛內大臣的索額圖突然「以老乞休」，¹³⁸顯係因前事遭逼退，而康熙皇帝對胤祔漸有防備，也大約在此前後。以「悖亂」案之後十年間，諸皇子奉旨隨皇帝巡行情形為例，茲表列如下：

¹³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12，頁152下-153上，康熙四十二年五月癸亥條。

¹³⁸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05，頁92上，康熙四十年九月戊申條。

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諸皇子隨皇帝巡行天下表

隨行皇子序齒、名字			皇太子	皇長子	皇三子	皇四子	皇五子	皇七子	皇八子	皇九子	皇十子	皇十三子	皇十四子	皇十五子	皇十六子	皇十七子	皇十八子	備 註
巡行時間、地點			胤初	胤禔	胤祉	胤禛	胤祺	胤祐	胤禩	胤禪	胤祥	胤禔	胤禩	胤禩	胤禩	胤禩	胤禩	
啟蹕日期	回京日期	地 點																
37. 1.27.	37. 2.22.	五臺山		○	○													
37. 4.29.	37. 5.10.	漕河		○	○													
37. 7.29.	37.11.13.	盛京		○	○		○	○		○	○	○						祭祖陵
38. 2. 3.	38. 5.17.	江南		○	○		○	○		○		○	○					第三次南巡
38.閏 7.17.	38. 9.10.	塞外		○	○	○	○	○	○			○	○					
38.11.14.	38.12. 4.	遵化		○						○		○	○					謁陵
39. 1.29.	39. 2.17.	永定河				○		○				○						
39. 7.26.	39. 9.12.	塞外	○		○	○	○		○			○	○	○	○			
39.10.14.	39.10.19.	永定河				○						○						
40. 2. 1.	40. 2.22.	畿甸	○	○		○						○						
40. 4.20.	40. 4.28.	永定河	○			○						○						
40. 5.30.	40. 9.21.	塞外	○	○	○	○			○			○	○	○	○			
40.11.24.	40.12.17.	遵化	○			○						○	○					謁陵
41. 1.28.	41. 2.28.	五臺山	○			○						○						
41. 6. 9.	41. 8.29.	塞外	○	○		○						○	○	○	○			
41. 9.25	41.10.26.	江南	○			○						○						第四次南巡， 因胤初患病， 中途返京
42. 1.16.	42. 3.15.	江南	○			○						○						重啟第四次南 巡行程
42. 5.25.	42. 9.21.	塞外	○	○								○	○	○	○			
42.10.11.	42.12.19.	西安	○		○							○						
43. 6. 7.	43. 9.26.	塞外	○	○					○			○	○	○	○			
43.10.24.	43.11. 1.	永定河	○									○						
44. 2. 9.	44.閏 4.28.	江南	○									○						第五次南巡
44. 5.24.	44. 9.15.	塞外	○	○								○		○	○	○		
44.11.19	44.12.19.	遵化						○				○						謁陵
45. 2. 4.	45. 2.25	畿甸	○	○		○				○		○						
45. 5.21.	45. 9.24.	塞外	○	○								○		○	○			
45.11.20.	45.12.18.	遵化	○	○								○						謁陵
46. 1.22.	46. 5.22.	江南	○	○								○		○	○			第六次南巡
46. 6. 6.	46.10.20.	塞外	○	○								○		○	○	○	○	
47. 2.17.	47. 3. 9.	畿甸	○	○								○		○	○		○	
47. 5.11.	47. 9.16.	塞外	○	○								○	○	○	○	○	○	返京途中宣布 廢太子
巡行次數	31	隨行次數	22	19	8	13	4	5	4	4	1	29	10	11	11	3	3	

資料來源：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自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1708），皇帝巡行天下三十一次，以皇十三子胤祥（1686-1730）隨行二十九次最多，皇太子胤礽二十二次則居次。皇帝從未說明指定某皇子隨行的原因，¹³⁹但是胤礽自康熙三十九年之後，只有三十九年兩次巡視永定河、四十四年遵化謁陵未陪同，將之與索額圖案連結，則就近監管的用意至明。

論者多根據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帝所說「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朕悉知其情，將索額圖處死」，¹⁴⁰認為「從前」即指康熙三十九年。¹⁴¹然而，康熙皇帝若接獲謀奪皇權的密報，竟能以寬容的態度「留內三年」，實殊不可解。又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一年，1702）途中，胤礽患病暫住德州，皇帝卻傳喚紀錄不良的索額圖前來奉侍，而先行回鑾，¹⁴²更有違常理。若參照前兩次皇太子身邊侍從、下人的不敬和僭越的案例，索額圖在康熙三十九年觸犯的情節或許類似，因為他具有皇親、重臣的身分，所以皇帝採取較和緩的方式來處理。惟兩人的行徑並未因而收斂，所謂的「潛謀大事」，更有可能是在德州進行。康熙皇帝為維繫親情，自然不能罪及胤礽，索額圖遂成為維護皇權尊嚴下的犧牲品。¹⁴³

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康熙皇帝在北巡回程途中，訓斥諸皇子恣意凌辱大臣，曰：

近日聞諸阿哥常撻辱諸大臣、侍衛，又每尋釁端，加苦毒於諸王、貝勒等。……朕為天下元后，凡事但遵大義，而行無罪之人，未嘗妄法處治。國家惟有一主，……諸阿哥擅辱大小官員，傷國家大體，此風斷不可長。伊等不遵國

¹³⁹ 楊珍曾就康熙皇帝的態度，以及諸皇子的性格、表現進行分析，可供參考。見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212-240。

¹⁴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6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¹⁴¹ 王思治，〈索額圖其人——兼論助皇太子「潛謀大事」〉，《清史研究》，1992：1（北京，1992.3），頁23-24；楊珍，〈索額圖研究〉，收入《清史論叢》編委會編，《清史論叢·1996》（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22-123。

¹⁴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10，頁130上，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壬午條；同書，卷210，頁131上-131下，康熙四十一年十月戊戌條。

¹⁴³ 葉高樹，〈滿洲親貴與清初政治：都英額地方赫舍里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10.6），頁221-225。

憲，橫作威勢，致令臣僕無以自存，是欲分朕威柄，以恣其行事也。豈知大權所在，何得分毫假人？¹⁴⁴

這則上諭除約束諸皇子的行為，更在宣示皇權不容侵奪；看似突如其來，其實正透露他擔心皇權遭分化的焦慮，以及宣告將面對這個情境。九月初四日，康熙皇帝在布爾阿蘇台行宮召集王公大臣、文武官員，命皇太子胤禔下跪，諭曰：

（胤禔）不法祖德，不遵朕訓，惟肆惡虐眾，暴戾淫亂，難出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惡愈張，……專擅威權，鳩聚黨與，窺伺朕躬，起居動作，無不探聽。……朕巡幸陝西、江南、浙江等處，……未嘗跬步妄出，未嘗一事擾民，乃允禔同伊屬下人等，恣行乖戾，無所不至，令朕報於啟齒。……種種惡端，不可枚舉，朕尚冀其悔過自新，故隱忍優容至於今日。又朕知允禔賦性奢侈，著伊乳母之父凌普為內務府總管，俾伊便於取用，……窮奢極欲，逞其兇惡，今更滋甚，……十八阿哥（胤祹，1701-1708）患病，眾皆以朕年高，無不為朕憂慮，伊係親兄，毫無友愛之意，因朕加責讓，伊反忿然發怒。更可異者，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縫，向內窺視。從前索額圖助伊潛謀大事，……今允禔欲為索額圖復仇，結成黨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鳩，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且允禔生而剋母，此等之人，古稱不孝。……恣取國帑，干預政事，必致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若此不孝、不仁之人，為君，其如祖業何？¹⁴⁵

隨即宣布「俟回京昭告於天地、太廟，將允禔廢斥」，也表示無意立「秉性躁急愚頑」的皇長子胤禔（1672-1734）為太子。¹⁴⁶ 皇帝一

¹⁴⁴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3，頁334下-335上，康熙四十七年八月辛未條。

¹⁴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6上-337上，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¹⁴⁶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7上，康熙四十七

面指控胤礽的敗德劣跡，一面拿自己的言行、處境作對比，進而決定廢斥胤礽，並阻斷其他皇子覬覦儲位之心，正是典型的克服焦慮的反應。¹⁴⁷

身為集權的統治者，康熙皇帝既已深悉胤礽的素行，對其逞凶行惡竟「赧於啓齒」，窮奢極慾則設法「俾伊便於取用」，涉嫌謀己也只能「晝夜戒慎不寧」，一切無非是為掩飾長久以來的溺愛和縱容，而胤礽的種種罪狀也可能遭皇帝過度解讀。¹⁴⁸做為累積近半世紀統治經驗的帝王，康熙皇帝歷經無數大風大浪，卻在公開指責胤礽之前，先因情緒略微失控而「垂涕」；¹⁴⁹言畢，復「痛哭仆地」，¹⁵⁰幾近崩潰；五天後，向臣工提及：「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至今六日未嘗安寢」，猶「涕泣不已」；¹⁵¹經過月餘，還是「無日不流涕」。¹⁵²雖說身體「照常安適，但漸覺虛弱」，在國事、家事交相煎熬下，「遂至心氣不寧，精神恍惚」。¹⁵³然而，扮演疼愛子女的父親角色，康熙皇帝縱使咒罵胤礽是「生而剋母」的不孝之人，也下定決心要剷除其黨人，卻始終無法割捨對他的情感，不惜將胤礽違常的舉止歸咎於為鬼魅所憑、染狂疾所致。¹⁵⁴十月底，康熙皇帝終究壓抑不住對胤礽的思念，不但

年九月丁丑條。

¹⁴⁷ 羅洛·梅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頁21-22。

¹⁴⁸ 例如：「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縫，向內窺視」一事，經調查後，康熙皇帝認為胤礽並無謀逆的意圖。見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251-259。

¹⁴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6上，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¹⁵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7上，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丑條。

¹⁵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8上，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午條。

¹⁵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49下，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乙丑條。

¹⁵³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51上，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丙戌條。

¹⁵⁴ 康熙皇帝在宣布廢太子之前，三度提及胤礽可能中邪或精神錯亂。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4，頁339上，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甲申條；同書，卷234，頁339上，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戊子條；同書，卷234，頁339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條。

召見幽禁中的廢太子，還將他移至咸安宮安養，以便「念之復可召見，胸中亦不更有鬱結矣」，¹⁵⁵顯然對廢太子事感到後悔；又云：「自禁允礽之後，朕日日不能釋然於懷，染疾以來，召見一次，胸中疏快一次」。¹⁵⁶法國耶穌會神父殷宏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對這段過程有生動的記載：

皇帝想見見被廢的太子，把他從監獄中傳了出來，這位不幸的皇子被領到康熙皇帝面前時，仍戴著囚犯的鎖鏈。他向他的父皇哀叫，皇帝為之動情，甚至掉下了眼淚。他多次詢問大臣們，他是否有權釋放一個眾所周知的無辜受屈的兒子。¹⁵⁷

未幾，胤礽獲釋，康熙皇帝向諸王、大臣表示：「今日朕意中之事，俱已明白，想明天為始，朕體全愈矣」，¹⁵⁸愉悅之情溢於言表。

釋放胤礽，即預示康熙皇帝再立他為儲君的可能。在處置廢太子的過程中，皇帝發現不僅胤禔對爭取儲位躍躍欲試，皇八子胤禩更聚集黨羽、動作頻頻；¹⁵⁹在與群臣會商繼任儲君人選時，

¹⁵⁵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49下，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乙丑條。

¹⁵⁶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53上，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條。

¹⁵⁷ 法·殷宏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皇儲廢立之謎·耶穌會殷宏緒給中國和印度傳教會總會長的信〉，收入法·白晉（Joachim Bouvet）等著，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頁213。

¹⁵⁸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53下，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戊子條。康熙皇帝在釋放胤礽之前已預做安排，他一方面向群臣說明廢太子的狂疾「漸已清爽，亦自知其罪」，但對近來發生之事「全然不知」；另一方面，將「一切暗中構煽悖亂行事」的責任，都歸於索額圖父子。其實，鬼魅、狂疾之說，未必真實，而索額圖父子早已伏法，不可能在數年之後繼續興風作浪，皇帝所言，無非是為要胤礽的處境開脫。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50上-350下，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辰條。

¹⁵⁹ 有關諸皇子及其黨人反皇太子舉動的討論，見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266-282；專論胤禩黨活動者，見吳秀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頁111-119。

滿、漢官僚竟「私相計議」、「暗通消息」，一致推舉胤禩，¹⁶⁰這些舉動在康熙皇帝看來，都是對皇權的侵犯，於是展開對胤禩黨、胤禩黨的打擊，¹⁶¹以清除第二次立儲的障礙。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初十日，康熙皇帝獨排眾議，復立胤礽為皇太子。雖然康熙皇帝對胤礽嚴加看管，¹⁶²並未因前次不愉快的經驗，在制度上有所調整；皇太子也未記教訓，在態度上有所改變，反而暴露對接班的迫不急待，¹⁶³其結果可想而知。迨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一日，皇帝頒布第二次廢太子的上諭，並詳述過去數年來的心境，曰：

自釋放皇太子六年之間，隱忍不易，唯朕乃能之。即今皇太子飲食、服御、陳設等物，較之於朕，殆有倍之。伊所奏欲責之人，朕無不責；欲處之人，朕無不處；……此何以故？凡以如所欲行，感悅其心，冀其遷善也。朕如此俯從，而仍怙惡不悛，是以灰心毫無可望。……朕之心思用盡，容顏清減，眾皆緘默，曾無一人如此勸朕者。……前番之事，朕實憤懣，此番毫不憤懣，談笑處之而已。¹⁶⁴

既然胤礽在曲意優容之下，猶不知悛改，康熙皇帝遂決意擺脫心理束縛，再次將他廢黜禁錮。其後，群臣屢次具摺建請立儲，康

¹⁶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35，頁351下，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丙戌條。

¹⁶¹ 林乾，《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頁245-271。

¹⁶² 據朝鮮使臣的描述：「太子經變之後，帝操切甚嚴，使不得須臾離側」。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漢城：探求堂，1973年），冊40，卷52，頁457，肅宗三十八年（1712）十二月癸酉條。

¹⁶³ 根據朝鮮方面的記載：「上與提調李頤命、趙泰耆論康熙太子處置事。頤命曰：『聞太子性甚悻戾，每言：「古今天下，豈有四十年太子乎？」其性行可知。……』泰耆曰：『太子無狀，多受賄賂，且諸王互相樹黨，康熙若死，則國事可知。……』上然其言」。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肅宗實錄》，冊40，卷54，頁521，肅宗三十九年（1713）十一月丙寅條。

¹⁶⁴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21，頁T11609-T11613，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辛亥。《起居注》言「六年之間」，然自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至五十一年十月，實際上只有四年，故《實錄》改作「數年之間」。見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51，頁487上-487下，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條。

熙皇帝也多次發表對此事的看法。例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大學士王揆（1645-1728）密奏、御史陳嘉猷等公疏，俱奏請立皇太子以分理政務，康熙皇帝作出「此等大事，朕豈有遺忘之理？」「天下之事，豈可分理乎？」的回應，¹⁶⁵旋即公開表明「天下大權，當統於一」，¹⁶⁶說明他已自認有效地解決皇權分化的危機。

四、競爭：評價歷史與自我評價

康熙皇帝撰有〈慎幾微論〉一文，闡述嚴格律己、防微杜漸的道理，¹⁶⁷深悉「一事不謹，即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即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的危害，¹⁶⁸用於治國，則凡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¹⁶⁹然而，他過度放任胤祔，且只重才學訓練而忽略德行養成，後世史家評之為「盛明之缺失」，也是造成諸皇子激烈鬥爭的重要原因；¹⁷⁰三次親征朔漠，即便自認「二十餘年狡悍陸梁之勁寇，曾不二載，悉皆草薶禽獮，而大業克就矣」，¹⁷¹惟「務期一舉殄滅」的目標實未達成。¹⁷²以上兩事尚不致鬆動皇權的根基，對「凡一事不妥，即歸罪於己，未嘗一時不自責也」的康熙皇帝而言，¹⁷³不免是晚年的

¹⁶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3，頁2464，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丙子。

¹⁶⁶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7上，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

¹⁶⁷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初集》，卷17，〈論·慎幾微論〉，頁4-5。孟昭信認為，此文是「君主自我約束機制」。見孟昭信，《康熙評傳》，頁271-276。

¹⁶⁸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6上，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

¹⁶⁹ 清·清聖祖御製，清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717，頁2。

¹⁷⁰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下冊，頁452-468。

¹⁷¹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20，〈序·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頁2-3。

¹⁷²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25，〈北征敕諭·諭領侍衛內大臣國舅佟國維內大臣福善蘇爾達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頁1。

¹⁷³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7，〈敕諭·諭大學士九卿等〉，頁5。

遺憾。

由於對自身的要求和期許極高，康熙皇帝常從朝代競賽的角度，為自己的表現在歷史中尋找定位。就立儲而言，歷經二立二廢的紛擾後，他將個人的失策及其引發的不愉快經驗，導向難以跳脫的歷史規律，指出自「漢、唐以來，太子幼冲，值人君享國日淺，尚保無事。若太子年長，其左右群小結黨，日久鮮有能無事者」。¹⁷⁴面對此一困局，他將評斷的標準界定為君臣能否秉持無私的用心，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朕御極五十餘年，朝乾夕惕，上念祖宗遺緒之重，下念臣民仰望之殷，乾綱獨斷，柔遠能邇，體恤臣庶，毫無私心。……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為心者方可，豈宜輕舉？即臣僚為國為民，念茲在茲，先憂後樂者，實不易得。觀今之居官者，祇如翰苑通套文章，全無實際。太子之為國本，朕豈不知？本一不正，關係非輕。¹⁷⁵

廢立太子的權柄操在君主，政治責任卻由君臣共同承擔，康熙皇帝的目的，在坐實「懷私倡議」的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的罪名；¹⁷⁶為避免重蹈覆轍，也積極地提出「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為心」的原則，為子孫訂立規範。¹⁷⁷

就開邊而言，雖然康熙皇帝征服準噶爾的軍事行動未竟全功，但是對秦築長城之舉不以為然，曾作〈蒙恬所築長城〉詩，云：「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誇。當時用盡民生力，天下

¹⁷⁴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21，頁T11904，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庚戌。

¹⁷⁵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21，頁T11905-T11906，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庚戌。

¹⁷⁶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冊21，頁T11903，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庚戌。

¹⁷⁷ 楊珍根據康熙皇帝在第二次廢太子後所發表有關立儲的上諭，歸納出幾項遴選繼承人的原則：一、皇帝全權決定；二、擇賢而立；三、對儲君暗中考察、培養；四、嚴格保密，形成「秘密建儲」的思想。見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330-335。

何曾屬爾家？」¹⁷⁸認為是妨害民生、無益邊防。遇有官員建請整修邊牆，即斷然拒絕，曰：

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¹⁷⁹

他對統治中國的政權長期為游牧民族所苦，原本表示不可理解，當第三次親征從陝西神木縣行至榆林，放眼望去，「皆係大沙山，甚為險惡，非兵行之地也」，始知「古人拓土用兵，修建長城，天下脂膏，盡耗西北，亦不為過也」，惟堅持不動用民力去修長城，因為「非今人之所能，仁者之所為」，¹⁸⁰這也是他自認勝過前代君主之處。

評論時事，康熙皇帝的所作所為不容臣下質疑，只有他可以援古論今，來為施政辯護。評價歷史，歷代治亂興衰，成敗得失自有公論，惟常因「史官舞文杜撰，顛倒是非者，概難憑信」，以致「人心不服」。¹⁸¹因此，他要求史臣，「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為一偏之論」，¹⁸²然亦不允許恣意議論古來帝王。以對纂修《明史》諸臣的指示為例，曰：

（禮部尚書）熊賜履（1635-1709）寫簽呈奏，於洪武（明太

¹⁷⁸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初集》，卷36，〈古今體詩·蒙恬所築長城〉，頁4。

¹⁷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52，頁677下-678上，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條。又康熙皇帝在〈出畿東觀秋成〉詩，亦云：「戍樓烽火息，險豈藉長城」。見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49，〈古今體詩·出畿東觀秋成〉，頁4。

¹⁸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147，〈皇太子胤礽恭請聖安並報三阿哥病勢等事摺〉，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硃批」。

¹⁸¹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7，〈敕諭·諭大學士九卿等〉，頁5。

¹⁸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54，頁701上，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己卯條。

祖，1328-1398，1368-1398在位）、宣德（明宣宗，1399-1435，1426-1435在位）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雖運會不同，事蹟攸殊，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謨烈垂諸奕世，為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朝夕罔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間隙，議論其是非，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實無此意也。朕自返厥躬於古之聖君，既不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¹⁸³

表面上是告誡臣子應以謙卑的態度面對歷史，實際則在皇權獨尊的前提下，提醒史臣：「朕亦一代之主」。康熙皇帝在意的，不只是洪武、宣德的歷史評價，更在於他們所代表的皇帝體制；君、臣評論前代君主的意見分歧，按康熙皇帝的看法，全係因位階不同而造成認知差異。

康熙皇帝曾說：「為君難，為臣不易」，語出《論語》，向來被奉為興邦明訓。¹⁸⁴康熙皇帝繼位之初，太皇太后即以「為君難」作書訓誡，使他了解「蒼生至眾，天子以一身君臨其上，生養撫育，無不引領而望，必深思得眾則得國之道」；¹⁸⁵康熙十二年（1673），講官熊賜履、喇沙里、孫在豐（1644-1689）為皇帝進講《論語》是章，¹⁸⁶據以闡述「國家之興亡，由於君心之敬肆」之義，「蓋人君勢分崇高，威福由己，若無難為者，不知君之一身，上則天命去留所繫，下則人心向背所關。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慎，或致無窮之患」。¹⁸⁷康熙皇帝深悉「為君難」的道理，惟議論歷史者率皆人臣，永遠無法體會為君者的難處。對過

¹⁸³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154，頁700上-700下，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丁丑條。

¹⁸⁴ 清·喇沙里、陳敬廷等奉敕編，《日講四書解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208，卷9，〈論語·子路〉，頁17。

¹⁸⁵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40，〈雜著·庭訓〉，頁1。

¹⁸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1，頁123，康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戊子。

¹⁸⁷ 清·喇沙里、陳敬廷等奉敕編，《日講四書解義》，卷9，〈論語·子路〉，頁15-16。

去或現在的批評，康熙皇帝可以憑藉專制君主的權威，訂定臧否的準繩，並諭令臣民遵循；一旦意識到自己亦將走入歷史，而成為接受評判的對象時，這位叱吒風雲的帝王頓時陷入無力與無助的情緒中。

歷經兩度廢皇太子之後，康熙皇帝的身心大受影響，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以致對個人生命、政權前途充滿不確定感，乃於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發布一份篇幅極長的上諭，預先為自己的一生做總結。¹⁸⁸主要的內容，略可歸納為：一、做為秦、漢以降在位最久的帝王，卻無法預知身後世人將如何評論，為此感到驚惶不安，特撰文以示用心。二、自認即位以來，兢兢業業，須知為君者殫精竭慮以治天下，其間的勞苦艱辛實非常人所能想像，議論者卻極盡挑剔、醜化之能事。雖說「為君難，為臣不易」，然為君者身負重責永無休止，其「難」遠非臣的「不易」可以比擬，頗有「君難為」之嘆。三、強調凡事親力親為、未雨綢繆，憑藉的是強健的體魄與自律的生活，以杜後人縱情聲色、親暱小人之譏。四、自覺年邁體衰，深恐辛勤經營的業績，因心神耗減而無法保全，前車之鑑，歷歷在目。¹⁸⁹可知康熙皇帝晚年焦慮心理的形成原因，主要來自無法確知個人歷史定位產生的恐慌。

他克服焦慮的方案，是一方面主動出擊，亦即與其身後被動接受評價，不如生前自我評判，使後人不致踰越他所劃定的底限；另一方面，則持續批判那些毫無同理心、好為譏評的「書生」。例如：「從來書生論歷代帝王，多指摘過失，謂其安享富貴，耽於逸樂。朕披閱史書，歷觀古來帝王，因深知為君之難。即朕六十年宵旰勤勞，雖金石為質，亦應消耗，況氣血之身乎」；¹⁹⁰「書生輩但知譏評往事，前代帝王，雖無過失，亦必刻意指

¹⁸⁸ 史景遷詮釋此篇，認為康熙皇帝將之視為一生的總結。見史景遷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頁202。姚念慈的解讀，則主張是在維持祖宗家業於不墜的前提下，論證清朝得國之正的合法地位。姚氏的主要觀點，見本文「註11」的說明。

¹⁸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5下-697上，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

¹⁹⁰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84，頁770下，康熙五十八

摘，論列長短，全無公是公非」，¹⁹¹以凸顯其立論偏頗、識見褊狹。雖然做出若干防範措施，康熙皇帝仍缺乏自信，究其所以，全在儲位懸而未決。他在同一份上諭中便提到：「漢高祖（256B.C.-195B.C.，202B.C.-195B.C.在位）傳遺命於呂后（241B.C.-180B.C.），唐太宗（598-649，626-649在位）定儲位於長孫無忌（594-659），朕每覽此，深為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後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¹⁹²是藉由檢討歷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猶不免在此事留下瑕疵的事例，說明自己絕不允許近倖、小人置喙的決心，用以擺脫心理上的陰影。

康熙皇帝相信，子孫不致對己有惡評，帝國臣民亦不敢妄加議論，但是根據歷史經驗法則，改朝換代在所難免，後世對前朝的論斷已非他的能力所能控制。康熙六十年（1721），他下令重新議定歷代帝王廟崇祀對象，曰：

朕觀歷代帝王廟所崇祀者，每朝不過一、二位，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書生妄論而定，甚未允當。況前代帝王，曾為天下主，後世之人，俱分屬臣子，而可輕肆議論，定其崇祀與不崇祀乎？……前代帝王，既無後裔，後之君天下者，繼其統緒，即當崇其祀典。朕君臨宇內，不得不為前人言也。朕意以為，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弑、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¹⁹³

年四月辛亥條。

¹⁹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92，頁838上，康熙六十年四月丙申條。

¹⁹²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7上，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

¹⁹³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92，頁838上，康熙六十年四月丙申條。致祭歷代帝王廟之舉，始於唐天寶六載在長安城內建三皇五帝廟；次年，於該廟鄰近處另置一廟，致祭三皇以前帝王，歷代帝王筆跡之處未有祠宇者，由該郡置廟享祭。明洪武六年，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欽天山，奉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帝、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旋寢周文王、唐高祖之祀，增列隋高祖，共十七帝；明嘉靖九年，在北京城西建歷代帝王廟，並罷南京廟祭。又據《明會典》所載，洪武二十一年罷隋文帝、二十四年罷元世祖，故為十五帝。順治二年，攝政王多爾袞指示禮

這個不尋常的舉動，透露出他欲確保能獲新政權奉祀的意向。次年，禮部奏陳，除無道、亡國外，「偏據一方，不入正統」者亦不應崇祀，康熙皇帝自然不受影響，但是他為掩飾個人的企圖，特別指出：「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神宗，1563-1620，1573-1620在位）、泰昌（光宗，1582-1620，1620在位）、天啓（熹宗，1605-1627，1620-1627在位）三朝」，應將之排除，「愍帝（思宗，1611-1644，1627-1644在位）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則不宜與亡國之君同論，¹⁹⁴以示標準並非寬鬆、浮濫，遂要求再行研議。上以種種，能否發揮作用，猶在未定之數，是以康熙皇帝的餘生，大約都處於對自身歷史定位的焦慮感之中。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皇帝駕崩，雍親王胤禛嗣位。禮部即遵大行皇帝諭旨議覆，將歷代帝王廟原祀二十一位，增列一百四十三位，共計一百六十四帝；其中，秦以前的帝王有八十位，之後則有八十四位，甫登基的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立刻裁示依議速行。¹⁹⁵為此，雍正皇帝撰〈歷代帝王廟碑文〉，說明入祠帝王大幅增加的原由，曰：

部，將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列入應祭歷代帝王，凡二十一帝；順治十七年，議定增列歷代「守成之君」七帝，遼、金、元三朝太祖因「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諸帝王，不宜與祭」，則共得二十五帝。見宋·王溥，《唐會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606，卷22，〈前代帝王〉，頁17-19；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卷50，〈禮志·吉禮四·歷代帝王陵廟〉，頁1292-1293；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卷91，〈禮部·群祀·歷代帝王〉，頁517下；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15，頁130下，順治二年三月甲申條；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136，頁1050下-1051上，順治十七年六月己丑條。

¹⁹⁴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97，頁878下，康熙六十一年四月辛酉條。

¹⁹⁵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2，頁53下-55上，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壬戌條。禮部所言原祀二十一位，係依順治二年之制，惟順治十七年另有增刪，入祀人數為二十五位，禮部未採現行制度的原因，在於順治十七年之制，排除遼、金、元的太祖，形同否定非漢民族政權的開創者，與清朝的立場相抵觸；對照《明會典》記明太祖罷元世祖入祀，清朝官修《明史》則略而不提，《世宗實錄》便延續此一筆法，直接採用順治二年的規定。

當明初定制時，議禮之臣不能通知大體，崇祀祇創業之君，……我皇考聖祖仁皇帝，秉大公之道，折衷百代，……特頒諭旨，命廷臣詳悉從容，確議具奏。逮朕紹緒之初，廷議始上舊崇祀帝王二十一位，今增一百四十三位，……聖祖皇帝之重加釐訂，公當周詳，誠千萬世莫及之仁心，而千萬世不易之定論也。¹⁹⁶

按康熙皇帝的計算，「自黃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稱帝者三百有餘」，「(秦)始皇(259B.C.-210B.C., 246B.C.-210B.C.在位)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餘年，稱帝而有年號者，二百一十有一」，¹⁹⁷則古來君王約有半數得入廟，秦以後的皇帝們也將近百分之四十。因此，就易代以後「報功崇德」的入祀原則觀之，¹⁹⁸以康熙皇帝成就的功業，實屬多慮。

又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在父親忌辰(十一月十三日)過後，以人子、人臣、人君的多重身分，從「爲君難」的角度，向群臣發表長篇悼念感言，曰：

朕侍皇考四十年來，伏見皇考憂勤惕勵，宵旰不遑，未能窺測一二。或遇一事，似難區處，而行之坦然；或遇一事，似屬尋常，而倍多委曲。或有一人，似不可用，而用之不疑；或有一人，似若可用，而置之不用。彼時茫然不解其故，及今乃知爲君之難，非親歷其境，不知其中以萬難、萬苦處也。朕以爲子者，積數十年之久，日侍左右，

¹⁹⁶ 清·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300，卷14，〈碑文·歷代帝王廟碑文〉，頁1-2。

¹⁹⁷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275，頁695下，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條。

¹⁹⁸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十六)》，卷1210，頁219下，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條。又乾隆皇帝認為，康熙六十一年議定崇祀帝王的内容存有爭議，下令重加詳議。其新定入祀歷代帝王人數：秦以前八十位，以後一百零七位，合計一百八十七位，人數更多。見同書，卷1210，頁218下-220上，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條；清·來保、李玉鳴等奉敕撰，《欽定大清通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655，卷9，〈吉禮·歷代帝王廟〉，頁1-3。

尚不能窺見皇考至難、至苦之處，爾等為臣者，豈能窺見人君難苦之處乎？……然為臣之難，朕向為子臣四十餘年，久已深知，而為君之難，諸臣豈能知之乎？古來崇尚虛文者，好為議論，謂如何乃盡君道，此皆不過空言懸揣，毫無當於實際。若但評斷帝王高下，猶易為立論，至於隱微深曲之處，未嘗躬履其境，身親其事，何能知其難也？故凡輕為論說者，皆所謂未見顏色而言者也。¹⁹⁹

面對好為議論者，「沖齡登極，深居九重」的康熙皇帝，²⁰⁰除用嚴詞譴責之外，只能以設身處地的道德勸說，然總有言猶未盡之憾，也未必能杜悠悠之口；在藩邸四十餘年的雍正皇帝，有非常人能及的閱歷，故維護其父歷史定位的立論，當更具說服力。

五、結 論

中國歷史上，久居其位的帝王晚年多諱言死亡，而執迷於追求長生；康熙皇帝雖能坦然面對生死，卻執著在同樣是無法掌握的「後人之議論」。他去世之後，群臣恭擬廟諡，曰「聖」，曰「仁」，雍正皇帝「祇薦『祖』號」。²⁰¹依前代諡法，「行道化民」、「窮理盡性」者曰「聖」，「蓄義豐功」、「慈民愛物」、「克己復禮」、「貴賢親親」者曰「仁」；²⁰²雍正皇帝以「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勲業，實為開創」，闡明「宜用『祖』號，方副豐功」，²⁰³可謂備極尊崇。然而，此一評價係來自「當時」，不足以化解康熙

¹⁹⁹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413，卷2，頁47-49，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諭曰。

²⁰⁰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頁52，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召諸王滿漢大臣諭曰。

²⁰¹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首，頁3上-3下，〈序·聖祖仁皇帝實錄序〉。

²⁰²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續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393，卷120，〈諡略〉，頁12、頁6。

²⁰³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一）》，卷1，頁41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條。

皇帝在世時對個人歷史定位的焦慮。

能代表後世政權對康熙皇帝的評價，目前只有《清史稿·聖祖本紀·論》，綜觀其評述，亦是推崇備至。若以儒家「修齊治平」的標準檢視，言「修身」，曰：「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爲古今所未觀」；論「治國」，曰：「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康熙皇帝應差可告慰。惟關乎「平天下」的開邊，雖然未能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仍稱「寰宇一統」；至於「齊家」，則略而不談。但是因立儲引發的廢立太子和諸皇子間的兄弟鬩牆，是康熙皇帝無可迴避的家庭糾紛，也是教子無方、處置失當必須承擔的後果，後世史家以「盛明缺失」評之，猶未爲過。

無論如何，對康熙皇帝而言，後世政權給予的整體評價，當屬差強人意；對於未竟之功以及可能造成惡評之處，他也了解癥結所在，並設法謀求對策。在立儲方面，自第二次廢太子之後，康熙皇帝一再表明將全權決定皇位繼承人選，既不許近倖干預、不容臣下置喙，並防杜諸皇子覬覦之心，一切顯得胸有成竹。在開邊方面，儘管準噶爾的威脅依舊存在，康熙皇帝在重建「天下主」地位的過程中，將帝國開疆拓土的軍事行動，演繹成維護天下秩序的必要手段，²⁰⁴如此一來，便取得用兵的正當性，也就不存在開邊的成敗問題。在歷史定位方面，因處理立儲、開邊的若干失策，導致康熙皇帝對即將面臨的歷史審判極度缺乏自信，故而藉由預先自我評價、導正惡意批評、尊崇歷代帝王等方法，期能爲自己塑造一定的歷史形象和地位。

近年，學者從康熙皇帝內怯和猜疑的心理、孤獨與惶惑的心境，以及炫耀盛世的心態，分析他在立廢儲君和對準戰爭過程中

²⁰⁴ 例如：康熙五十九年年底，清軍將準噶爾勢力逐出西藏，康熙皇帝於次年九月在拉薩建碑以紀其功，碑文引述諸蒙古部落及土伯特酋長奏言：「皇帝勇略神武，超越往代。天兵所臨，邪魔掃蕩。復興蒙古向所尊奉法教，坎麻藏衛等部人眾，咸得拔離湯火，樂土安居」。康熙皇帝據以申論，曰：「朕何功焉？而群眾勤請不已，爰紀斯文，立碑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眾興教云爾」。見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卷23，〈碑文·平定西藏碑文〉，頁10-11。

的決策與作為；²⁰⁵本文則另就心理學「焦慮」的角度，認為立儲、開邊、歷史定位等相互交錯的三大事，是康熙皇帝中晚年產生焦慮情緒的原因，但是他並未因持續的焦慮而陷入恐懼，而是形成「尋找外在的威脅來源—堅定個人的認知價值—提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的克服焦慮機制，終能獲得當時和後世的稱頌。又一般多以攝政時期（1644-1650）結束或輔政體制（1661-1669）瓦解，做為清朝皇權確立的標誌，²⁰⁶惟康熙朝中期以後因儲君制度的設計不良，以及準噶爾挑戰清朝皇帝的領導地位，又使趨於穩固的皇權出現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為解決儲位的紛爭，懲處參與諸皇子黨爭的八旗舊勢力，使皇權得以伸入下五旗；²⁰⁷為遏阻準噶爾的進擾，將帝國的重心轉向內陸亞洲，為日後多民族帝國的統治奠定基礎，由於他勇於面對並克服焦慮，也連帶促成清朝皇權無論對內、對外皆臻於不可動搖的境地。然而，皇權終究有其極限，統治者企圖藉以操縱後世的評價，無疑是將皇權做無限度的膨脹。

（責任編輯：王信杰 校對：楊鎮魁）

²⁰⁵ 參見姚念慈，〈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與皇太子的興廢及玄燁的內心世界〉，頁116-126、頁144-154；姚念慈，〈準噶爾之役與玄燁的盛世心態〉，頁381-412。

²⁰⁶ 姚念慈，〈多爾袞與皇權政治〉，收入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86-315；徐凱，〈清初攝政、輔政體制與皇權政治〉，《史學集刊》，2006：4（長春，2006.7），頁36-40。

²⁰⁷ 林乾，《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頁318-333。

引用書目

一、檔案資料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

清·勒庫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漢城：探求堂，1973年。

法·白晉（Joachim Bouvet）著，馬緒祥譯，《康熙帝傳》，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法·白晉（Joachim Bouvet）等著，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

二、官書典籍

宋·王溥，《唐會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6-6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明·申時行等修，《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清·喇沙里、陳敬廷等奉敕編，《日講四書解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72-73輯，第711-730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

清·王士禎，《居易錄》，清康熙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清·劉健，《庭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4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

- 清·溫達等奉敕撰，《聖祖仁皇帝親征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 清·清聖祖御製，張玉書、允祿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8-12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馬齊等修，《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清聖祖御製，清世宗纂，《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鄂爾泰等修，《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0-6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來保、李玉鳴等奉敕撰，《欽定大清通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嵇璜等奉敕撰，《欽定續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92-40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清高宗御製，蔣 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2-131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 清·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三、專書著作

- 王思治主編，《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收入朱誠如主編，《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
-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吳根友譯，《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 年。
- 伊·亞·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1635-1758）》，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 吳秀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年。
- 李秀梅，《清朝統一準噶爾史實研究：以高層決策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

- 孟森，《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孟昭信，《康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岡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紙》，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
- 林乾，《康熙懲抑朋黨與清代極權政治》，臺北：正展出版公司，2003年。
- 宮脇淳子著，曉克譯，《最後的游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年。
- 馮爾康，《雍正繼位之謎》，臺北：雲龍出版社，1991年。
- 馮爾康，《雍正繼位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
- 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廖月娟譯，《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4年。
- 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臺北：立緒文化公司，2004年。
- 羅致平等編著，《準噶爾史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Spence, Jonathan D. and Wills, John E. Jr. edited,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四、期刊論文

- 王思治，〈索額圖其人——兼論助皇太子「潛謀大事」〉，《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北京，1992年3月，頁16-27。
- 王爾敏，〈滿清入主華夏及其文化承緒之統一政術〉，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年，頁247-271。
- 朱金甫，〈論康熙時期的南書房〉，《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北京，1990年3月，頁27-38。
- 金承藝，〈胤禎：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收入金承藝，《清朝帝位之爭史事考》，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18-151。
- 姚念慈，〈多爾袞與皇權政治〉，收入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47-316。
- 姚念慈，〈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與皇太子的興廢及玄燁的內心世界〉，收入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

- 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71-161。
- 姚念慈，〈再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諭》、歷代帝王廟與玄燁的道學心訣〉，收入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162-249。
- 姚念慈，〈準噶爾之役與玄燁的興兵之由〉，收入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250-348。
- 姚念慈，〈準噶爾之役與玄燁的盛世心態〉，收入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評「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頁 349-453。
- 柳岳武，〈清廷康熙朝的西藏政策〉，《黑龍江民族叢刊》，2007 年第 6 期，哈爾濱，2007 年 12 月，頁 99-105。
- 洪用斌，〈試論烏蘭布通戰爭的結局〉，《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 年第 6 期，呼和浩特，1984 年 11 月，頁 60-65。
- 徐凱，〈清初攝政、輔政體制與皇權政治〉，《史學集刊》，2006 年第 4 期，長春，2006 年 7 月，頁 33-41。
- 袁森波，〈康熙與昭莫多之戰〉，《故宮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1 期，北京，1990 年 1 月，頁 41-49。
- 商鴻達，〈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漢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 年第 1 期，北京，1984 年 1 月，頁 55-62。
- 張羽新，〈烏蘭布通之戰的勝敗問題〉，《歷史研究》，1986 年第 5 期，北京，1986 年 10 月，頁 178-184。
- 莊吉發，〈清初諸帝的北巡及其政治活動〉，收入莊吉發，《清史論集（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頁 235-275。
- 陳捷先，〈從清初中央建置看滿洲漢化〉，收入陳捷先，《清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119-135。
- 陳捷先，〈清聖祖廢儲考原〉，收入陳捷先，《清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137-170。
- 華立，〈從日本的《唐船風說書》看康熙二十九年的烏蘭布通之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 卷 3 期，北京，2010 年 9 月，頁 39-54。
-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 本第 1 分，臺北，1987 年 3 月，頁 105-

131。

黑龍，〈烏蘭布通之戰再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北京，2006年7月，頁66-71。

黑龍，〈康熙帝首次親征噶爾丹與昭莫多之戰〉，《滿語研究》，2009年第2期，哈爾濱，2009年12月，頁129-136。

楊珍，〈索額圖研究〉，收入《清史論叢》編委會編，《清史論叢·1996》，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112-128。

楊嘉銘，〈歷輩章嘉呼圖克圖與達賴喇嘛的師徒關係〉，《青海民族研究》，24卷4期，西寧，2013年10月，頁107-111。

楊錦麟，〈筆帖式與1673-1683清朝決策系統〉，《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廈門，1984年3月，頁85-90。

葉高樹，〈滿洲親貴與清初政治：都英額地方赫舍里家族的個案研究〉，《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3期，臺北，2010年6月，頁173-230。

齊木德道爾吉，〈康熙之路——記康熙皇帝首次親征噶爾丹〉，收入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第6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9-199。

鄧建新，〈試論清朝扶植章嘉呼圖克圖系統的原因〉，《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3卷3期西寧，2007年7月，頁37-41。

Anxiety-driven Politics: Emperor K'ang-hsi's Dealing with Heir-selection, Frontier Expansion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Yeh, Kao-shu^{*}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Emperor K'ang-hsi's heir-selection, frontier expansion and arrangement for his historical evaluation to explain his reaction to the long lasting anxiety. Us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 of "anxi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ree aspects that troubled Emperor K'ang-hsi's latter part of reign. First, after K'ang-hsi was crowned over 30 years, tensions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crown prince intensified for the crown prince failed his task when K'ang-hsi went on the Galden expedition. Second, when the increasing military pressure from Junggar Khanate Galdan and their successors impeded the empire's frontier expansion, the imperial authority was challenged not only from outer military campaigns, but also from the unsettled heir succession process, which also led to, thirdly, the anxiety of K'ang-hsi emperor's reflection upon his own historical evaluation. Through resolution of internal power struggle, diversion of imperial frontier expansion towards inner Asia, and exercise of influence upon possible historical evaluation in advance, Emperor K'ang-hsi copied with his anxieties act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imperial power.

Keywords: Emperor K'ang-hsi, anxiety, In Ceng, Songgotu, Junggar, Galda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